

集會之門：十五至十七世紀張家口堡 基礎建設以及漢蒙滿資訊流通*

孔令偉**

提 要

十五至十七世紀張家口堡係中原北部、蒙古與遼東間的交通輻輳。通過張家口的商業活動，明朝試圖維繫所謂朝貢體系，在名義上將蒙古和女真（後改稱滿洲）納為藩屬。此外，明朝在張家口建立情報網絡用以搜集關於蒙古和女真的資訊。藉由派遣通蒙古語的間諜，明朝意圖分化蒙古和女真諸部之聯繫。要言之，明朝的邊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內亞各族群的合作。另一方面，蒙古和女真對朝貢體系有與明朝不同的解釋，因此反將「進貢」視為與中國進行經濟交換之良機。同時女真人亦利用張家口的關鍵地理位置與蒙古進行聯絡。換言之，張家口在滿蒙關係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通過使用多語種資料來源，本文從跨界視角闡述張家口的關鍵地位。

十五至十七世紀所形成的漢、蒙、滿文多語種史料，為研究明清之際張家口以及漢蒙滿關係提供多元史源。通過發掘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原檔》，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朝兵部題行檔》、《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等多語種檔案史料，並結合官書、奏議、文集等公私文書與故宮收藏之古地圖等圖像史料，本文重點由基礎建設以及資訊流通的視野切入，通過關注明代後期張家口及其周邊防禦工事與邊疆馬市之運作，考察該地漢、蒙、滿多元之族群互動。以此探討張家口在近世東北亞地緣政治轉型的進程中，所發揮之關鍵歷史作用。

關鍵詞：張家口堡、漢滿蒙關係、基礎建設、資訊流通、明清多語種檔案

* 收稿日期：2023年8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5月3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張家口位處河北、內蒙古與山西之要衝，歷代為華北地區之交通重鎮，更是農牧文化交界帶之輻輳。眾所周知，清代張家口曾是中原交通蒙古與俄羅斯的重要商業要津，惟從長時段的視野檢視張家口政經地位的興起及行政區劃的擴張，其發展則又可追溯至十七世紀上半葉明朝與蒙古封貢往來背景下的張家口堡。張家口堡於十五世紀為明朝所建，隸屬宣府鎮西路萬全右衛，起初僅為其轄下軍事堡壘之一，行政地位並不顯著；然因其交通塞外的地理位置，加上隆慶議和後成為明蒙互市的經貿據點，在這個時空背景下，其對晚明與滿蒙間的資訊流通具有關鍵之歷史意義，就溝通近世東亞以及內陸亞洲而言尤然。本文聚焦於十五至十七世紀張家口堡之基礎建設，旁及周邊地區之發展，重點探究其在滿蒙漢資訊流通的歷史進程中所造成之影響。¹

具體而言，十七世紀初明朝、察哈爾蒙古（蒙 *caqar monggöl*）與金國（滿 *aisin gurun*）間的博弈，深刻左右日後中原與內亞的歷史發展，尤其對於十七世紀前期滿洲人的擴張乃至清朝之建立，均奠定深遠之影響。²十七世紀初漢、蒙、滿三者的交往過程中，位處三者交界帶的張家口，不僅是明朝的北疆要衝，更成為當時東北亞的交流核心。通過築城建堡、開關立市等基礎工程建設，明朝不僅佔據了張家口這個重要的戰略據點；同時也通過開市貿易，試圖籠絡蒙古諸部以對抗東邊新興的滿洲政權，並且蒐集打探滿洲與蒙古內部的相關情報。另一方面，蒙古諸部通過邊境貿易、請功邀賞乃至於寇邊劫掠的方式，補充了遊牧經濟的不足；張家口獨特的地理位置，正為蒙古人提供了絕佳的歷史舞台。在金國方面，亦不時派遣間諜前往張家口，一方面從事貿易，一方面窺視明蒙之間的互動。由此看來，在十七世紀初東北亞與內亞之間的經濟貿易與軍事情報網絡中，張家口實際上是為最重要的一個節點。因而十七世紀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諸如明朝的覆亡，蒙古諸部的歸附，乃至金國的崛起，皆與張家口有所關聯。從張家口出發梳理明朝後期與蒙滿之關係，不僅有助於推進華北農牧交界帶之多元族群史研究，同時亦能為深入理解近世東北亞的地緣政治轉型提供新興視野。

1 本文以下所稱張家口，除非特別註明外，均指明代的張家口堡及其周邊地帶，而非今日河北張家口市之行政區劃。

2 本文蒙古文轉寫採用美國圖書館協會——國會圖書館（ALA-LC）系統；滿文轉寫使用穆麟德（Möllendorf）系統。

十六世紀後期張家口業在明蒙互市的背景下，從一小地方堡壘躍升為東北亞經貿重鎮與交通樞紐，並在十七世紀明朝與蒙古、女真諸部間的互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不同於中原中心史觀將長城視為消極抵禦北亞遊牧民之屏障，十七世紀初的蒙古文與滿洲文史料，將張家口稱作 *bayan sübe*，蒙古文意即「富裕之口」。³ 此後清代滿蒙文獻又將張家口呼為「集會之門」（蒙 *cigulultu qağalga(n)*；滿 *imiyangga jase*）。⁴ 由此可見，在蒙古與滿洲脈絡中，張家口並非不可跨越之軍事屏障，反而在十七世紀漢、蒙、滿、俄多元族群互動的時空背景下，成為享有「富裕之口」與「集會之門」美譽的歐亞商業市集。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的張家口，一方面體現明朝晚期北疆邊防建設之起衰，同時亦見證蒙古、女真乃至後來滿洲之興替。⁵ 是以研究張家口之基礎建設與族群互動，不僅有助於深化對明清鼎革之認識，更能將晚明中國與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進行有機連結，進而將張家口置於更加廣袤多元的跨境（border-crossing）歷史脈絡中。

涉及明清時期張家口以及漢蒙滿關係之相關研究，可以放置在中國史、內亞史以及比較帝國史這三種不同的學術脈絡下進行討論。首先，張家口與明清邊疆史以及經濟史等中國史領域，關係密切。如孫召華、陳新海等人專門討論明清之際張家口的先行研究，多半從邊疆史的角度，聚焦於當地軍事制度以及互市經濟等議題。⁶ 與此同時，張家口一方面作為宣大鎮的重要堡寨，另一方亦是隆慶議和後明蒙互市之要道，故亦有必要進一步將其放置在九邊長城以及明蒙關係等更為寬廣的脈絡下進行討論。如艾沖、賴建誠、吳彥儒、趙現海、李巖、楊申茂、范熙暄、周小棣、川越泰博、John W. Dardess 等人主要研究明長城九邊防禦體系所

3 李保文編，《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arban doludugar jağun-u emün-e qağas-tu qolbuğdaqu mongğul üsüg-ün bičig debter*）（通遼：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頁 26-27；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冊 6，頁 233-235。

4（清）賽尚阿（*sayıšangg-a*）編，栗林均、斯欽巴圖重編，《蒙文倒綱—モンゴル語ローマ字転写配列一》（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14，據咸豐元年（1851）刊本整理），頁 103。

5 本文以「女真」與「滿洲」指涉不同時期金國（*aisin gurun*）與清朝（*daicing gurun*）的統治族群，尤其以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改其族名諸申（*jušen*，女真異名）為滿洲（*manju*）為分界。亦即 1635 年以前稱女真，其後稱滿洲。皇太極變諸申為滿州，參：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下冊（1967），頁 459-473。

6 孫召華，〈明代張家口堡考論〉，收入朱誠如、王天有編，《明清論叢·第 8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208-218；陳新海，〈明清時期草原絲路沿線城市張家口的發展與職能演變研究〉，《史學集刊》，2021 年 3 期，頁 60-68。

造成的軍事作用及財政影響；⁷ 另一方面，侯仁之、阿薩拉圖、李漪云、蕭國亮、曹永年、哈正利、余同元、呂美泉、唐玉萍、趙會清、王苗苗、金星、劉菽等人則從邊政史、財政史、貿易史等角度出發，側重張家口馬市的設置乃至明蒙互市的政治經濟意義。⁸ 這類研究主要關注明朝中央政府如何通過經營長城堡寨以及操作互市政策，從而處理蒙古諸部所造成之邊防問題。另一方面，亦有學者在關注政治、軍事議題的同時，進一步從社會史、環境史以及族群史的多元視角，探究明朝官方與長城沿線地方社會之互動關係，如邱仲麟曾就明朝長城沿邊森林資源之運用，乃至明廷對兀良哈三衛撫賞等議題，進行深入研究。⁹ 李華彥曾分別就明朝對察哈爾林丹汗以及兀良哈朵顏衛等蒙古諸部的撫賞政策，進行梳理。¹⁰

-
- 7 艾冲，《明代陝西四鎮長城》（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吳彥儒，《明嘉靖朝宣府鎮的軍事措施之研究：1521-1566》（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趙現海，《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李巖、張玉坤、解丹，《明長城九邊重鎮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8）；楊申茂、張玉坤、張萍，《明長城宣府鎮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8）；范熙暉、張玉坤、李巖，《明長城軍事防禦體系規劃佈局機制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9）；周小棟，《雄關漫道：明長城防禦體系的建造及保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21）；川越泰博，《明代長城の群像》（東京：汲古書院，2003）；John W. Dardess, *More than the Great Wall: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Ming National Security, 1368-164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 8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燕京學報》，23期（1937），頁183-237；阿薩拉圖，〈明代蒙古地區和中原間的貿易關係〉，《民族團結》，1964年Z1期，頁51-56；李漪云，〈明代長城腳下的蒙漢互市〉，《中國民族》，1981年5期，頁22-23；李漪云，〈從馬市中幾類商品看明中後期江南與塞北的經濟聯繫及其作用〉，《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4期，頁34-39；蕭國亮，〈明代後期蒙漢互市及其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年2期，頁64-70；曹永年，〈明代蒙古中晚期的經濟〉，《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2期，頁56-64；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年5期，頁55-70；哈正利，〈明代蒙漢民族貿易投影下的民族關係〉，《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3期，頁62-66；哈正利，〈明代蒙漢民族貿易淺析〉，《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5期，頁125-128；余同元，〈明代馬市市場考〉，《民族研究》，1998年1期，頁62-70；呂美泉，〈明朝馬市研究〉，《求是學刊》，1999年5期，頁98-102；唐玉萍，〈明朝嘉萬時期對蒙政策探論〉，《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6期，頁115-120；趙會清，〈明蒙的通貢與互市政策形成的原因初探〉，《滄桑》，2007年1期，頁20-21；王苗苗，〈明蒙互市貿易述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王苗苗，〈明代蒙漢互市貿易的建立及發展演變——以市口變化為中心〉，《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4輯（2011），頁81-109；王苗苗，〈略論明代遼東蒙漢互市貿易管理〉，《民族史研究》，第10輯（2011），頁68-81；金星，〈明朝與蒙古的貿易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劉菽、楊永康，〈朝貢視閥下的明蒙互市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年3期，頁135-145。
- 9 邱仲麟，〈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明代研究》，8期（2005.12），頁1-66；邱仲麟，〈明代長城線外的森林砍伐〉，《成大歷史學報》，41期（2011.12），頁33-102；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明代研究》，27期（2016.12），頁1-69。
- 10 李華彥，〈林丹汗索賞與崇禎朝遼東撫賞政策之重整〉，《亞洲研究》，10期（2010.8），頁51-82；李華彥，〈明朝朵顏衛的來源、發展與動向〉，《明代研究》，38期（2022.6），頁75-107。

至於明清鼎革以後張家口的軍事地位逐漸為經濟角色所超越，成為清朝對俄羅斯貿易的稅關，是以治經濟史、財政史、貿易史乃至中俄關係史諸領域的清史學人，皆對張家口有所關注。清代張家口、恰克圖與庫倫（今烏蘭巴托）之間的商業貿易，對於清代中國與俄羅斯的交往形成廣泛影響，故備受中外學界矚目，從而產生「張庫大道」、「茶葉之路」之說。¹¹ 實際上清代以張家口為核心的口外貿易，在大宗的茶葉之外，亦有手工藝品、皮草、金屬器以及藥材等各類商品之流通。賴惠敏通過有關清代華北與蒙古貿易的研究，深刻勾勒出張家口通往恰克圖、庫倫沿線商路上的社會經濟動態，以及貿易活動與清代政治、經濟、物質文化等諸多歷史議題之交錯。¹² 張哲嘉則對清代經張家口、恰克圖一線銷往蒙古、俄羅斯的大黃貿易及禁運事件之歷史意義進行闡釋。¹³ 在國際貿易之外，張家口亦是中原漢人移民前往蒙古地區的重要節點，對於經張家口移住口外的漢人移民聚落，蔡偉傑、王士銘等人有相關研究。¹⁴

與此同時，內亞史領域對於明清漢蒙滿關係之研究，亦對理解張家口及其周邊地區史地，富有參考價值。這方面的成果，早期係由歐洲東方學以及日本滿蒙史學的研究者開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諸如札奇斯欽、Henry Serruys、和田清、萩原淳平、森川哲雄等人。¹⁵ 相對於前述中國邊疆史的成果，內亞史的研究者在運用漢文史料的同時，亦注重使用參考蒙古文史料，並更加關心從蒙古社會內部的動態，來解釋明蒙關係的發展。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學術環境

11 Martha Avery, *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3); 段宏廣、劉振瑛,〈「張庫大道」研究述評〉,《長江叢刊》,2018年23期,頁68; 舒曼,〈古代張家口茶馬互市與張庫大道(茶葉之路)之芻議〉,《農業考古》,2014年2期,頁215-222。

12 賴惠敏,《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北京：中華書局,2020)。

13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期(2005.3),頁43-100。

14 蔡偉傑,〈居國中以避國：大沙畢與清代移民外蒙古之漢人及其後裔的蒙古化(1768-1830)〉,《歷史人類學學刊》,15卷2期(2017.10),頁129-167; 王士銘,〈清代庫倫至恰克圖間民人的土地開墾(1755-1911)〉,《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7期(2017.6),頁83-140; 王士銘,〈乾隆年間色楞格河流域的經貿政策與聚落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6期(2021.11),頁47-91。

15 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77); 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5);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 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東京：同朋社,1980); 森川哲雄,《15世紀—18世紀モンゴル史論考》(福岡：中国書店,2023)。

的改變，薄音湖、達力扎布、烏雲畢力格以及寶音德力根等內蒙古學者，在明代蒙古史取得重要的學術成果。¹⁶ 通過比對蒙古文以及漢文記載，上述學者的研究體現出運用多語種史料建構多元史觀之關鍵性。十七世紀初明清鼎革前後，明朝的漢文記載，與蒙古、滿洲方面的史料，往往因為書寫者的立場不同而有所出入，需要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是以由張家口為起點，重新書寫十七世紀前期的漢、蒙、滿關係，須重視多語種史料之運用。¹⁷

在結合中國與內亞的多文明史觀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參考長時段、跨地域的比較帝國史研究。從長時段看中國歷代長城意象的改變，可以發現長城並非亙古不變的疆域標誌，而是隨著不同時代中國對外思想而有所變化。如林蔚（Arthur Waldron）、城地孝等人的研究指出，後世視長城為嚴夷夏之防的象徵，實際上是晚明朝廷黨爭所造成的政治建構，並非自古以來存在的傳統。¹⁸ 至於繼承北魏滲透王朝遺產的唐帝國，或者作為征服王朝的蒙元或大清帝國，相較於修築長城，更傾向建構普世性的多元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從跨地域的角度來說，建築城牆亦是人類文明史上普遍存在之文化現象，David Frye 等人對於古希臘、羅馬、中國乃至美洲史上城牆的綜合研究，為從世界史廣度挑戰「文明／野蠻」、「我者／他者」的二元論述，提供具比較意義的參考。¹⁹ 綜合以上所述，通過晚明與清初統治者對於張家口的態度，不僅可以跨斷代地比較明清政權性質之異同，同時亦可重新發掘長城內外交流的實況，從而反思傳統國族主義史學消極對立的族群敘事。

綜合上述學界既有成果，可知前人對張家口與明長城之相關研究，過去主要利用《明實錄》等官書以及士人文集等漢文史料；惟亦有少數研究明蒙關係的學者，如烏雲畢力格、寶音德力根等人，強調多語種檔案之重要性。作為明清檔案

16 薄音湖，《青城論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達力扎布，《明代漢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寶音德力根，〈十五世紀前後蒙古政局、部落諸問題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7）。

17 ボルジギダイ・オヨーンビリグ，〈17世紀前半のモンゴル史に関する明朝兵部文書について〉，《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2號（2003.9），頁142-147；烏雲畢力格，〈明朝兵部檔案中有關林丹汗與察哈爾的史料〉，收入 Futaki Hiroshi, Demberel Ulziibaatar eds., *Researching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ngolian Histo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2004），頁203-230。

18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変容》（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

19 David Frye, *Wall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Blood and Brick* (London: Faber & Faber, 2018).

研究的先驅，徐中舒曾謂：「史料來源，當然不限於檔案，而檔案卻是一切史料當中，最重要的史料」。²⁰ 探討明清之際的張家口以及漢蒙滿關係，除了《明實錄》等官書外，多語種檔案亦是不可或缺之第一手材料。明清鼎革的過程中大量檔案燬於兵燹，至順治、康熙年間曾為修纂《明史》而徵集前朝所遺公文檔案，爾後部分藏之於內閣大庫。²¹ 這些明朝檔案二十世紀初因歷史原因而流散各處，然迄今存世數量仍逾萬件。現存的明朝檔案，以原本保存在內閣大庫內的《明朝兵部題行檔》為大宗，尤以明天啓（1621-1627）與崇禎（1628-1644）年間檔案數量最豐，其中內容多涉當時蒙古、女真事務，具題者包含宣大總督、宣府巡撫與宣大總兵等邊臣。這部分的材料今日主要分藏於史語所、一史館與遼寧省檔案館等機構。²²

《明朝兵部題行檔》中題行稿與塘報等各類公文書，大量地記錄了關於十七世紀上半葉明朝與蒙古在宣府鎮一帶的交涉詳情，以及當時明朝從蒙古方面所獲關於女真／滿洲的情報。²³ 這些檔案所反映的歷史事實因為事涉機密，普通官員難以得預，是以其中事由多為明代文集、筆記所無載。加之《崇禎長編》、《明史》等傳世史書乃入清以後所作，故汪楫（1636-1699）、張廷玉（1672-1755）等史家在涉及滿蒙舊事時，亦不得不有所筆削。²⁴ 由此說來，後人若能善用明清兩代作者所不能充分利用的檔案文書，對於未來重構十七世紀初明朝與滿蒙關係，無疑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這也正是 1928 年史語所成立後，傅斯年、陳寅恪等學人積極網羅內閣大庫檔案之動機。²⁵

20 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 本 4 分（1933），頁 574。

21 《清世祖實錄·順治五年九月》：「諭內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啓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內院，以備纂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順治五年九月九日，卷 40，頁 321；《清聖祖實錄·康熙四年八月》：「諭禮部：前於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啓甲子、丁卯兩年實錄及戊辰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查開送，至今未行查送。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所行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著查送」。《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6，康熙四年八月十六日，頁 239-240。

22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全 101 冊。

23 ボルジギダイ・オヨーンピリゲ，〈17 世紀前半のモンゴル史に する明朝兵部文書について〉，頁 142-147；烏雲畢力格，〈明朝兵部檔案中有關林丹汗與察哈爾的史料〉，頁 203-230。

24 （清）汪楫，《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鈔本）；（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25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 卷 1 期

除了今日分藏兩岸之明朝漢文檔案外，滿人入關以前所形成的檔冊，如《滿文原檔》與《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其中亦含有大量關於晚明張家口記載，係研究十七世紀明朝與滿蒙關係的重要材料。²⁶ 滿蒙文檔案中的線索，體現出張家口之於十七世紀內亞世界的重要性，與明朝檔案所反映的中原視野可以互相補充。通過結合明朝漢文檔案以及相關滿蒙文檔案，本文將結合中國史、內亞史乃至比較帝國史等多元視角，重點探討十七世紀前期張家口一帶明朝堡寨與馬市等基礎建設，以及漢蒙滿勢力之間的資訊流通。

二、張家口堡寨的修建與經營

張家口位於華北與內蒙古的農牧交界帶，而張北壩上草原歷代係中原農業與內亞游牧文明交匯之所，雙方之間有軍事衝突，亦有文化交流。自春秋以降，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突厥諸部，皆在張北草原與中原王朝產生互動，故有考古學者稱張家口一帶乃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之「三岔口」。²⁷ 歷代征服王朝入主中原，張家口及其周邊地區往往發揮關鍵作用。諸如 915 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872-926，916-926 在位）於炭山（今張家口市赤城縣獨石口鎮）南建漢城以圖幽燕，²⁸ 1122 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1123，1115-1123 在位）發兵追遼天祚帝（1075-1128，1101-1125 在位）於鴛鴦灤（今張家口市張北縣安固里淖），²⁹ 1211 年成吉思汗（1162-1227，1206-1227 在位）大敗金兵於野狐嶺（今張家口市張北縣野狐嶺），³⁰ 皆足證張家口一帶曾在遼、金、元鼎革的過程中發揮關鍵戰略意義。也由於其重要之軍事作用，張家口及其周邊在明邊防體系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也從而被標註在〈類書三才圖會·宣府邊圖〉等明代地圖中。³¹

就行政區劃而言，張家口及其周邊隸屬於明朝宣府鎮西路萬全右衛。延續遼、

（2020.3），頁 53-102。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編，《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27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局，1999），頁 34-51。

28（宋）司馬光編，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卷 266，頁 8678。

29（元）脫脫等纂，《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頁 36。

30（元）脫脫等纂，《金史》，卷 93，頁 2066。

31（明）王圻，《類書三才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印草堂後印本），冊 5，頁 17。

金、元諸代，明朝初年對於張家口一帶之戰略意義，即有所留意。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 在位）遣徐達（1332-1385）領兵攻陷元大都，改元洪武，正式建立明朝。另一方面，元惠宗妥懽帖睦爾（Toġan temür，1320-1370，1333-1370 在位）率部退回漠北，但仍用大元國號，成爲與明朝分庭抗禮之遊牧政權。北方蒙古勢力之南向，以及對蒙漢邊境的擄掠，成爲明朝初年的主要顧慮。然而明朝建立之初，以「斥堠未立，保聚爲難」之故，遂於洪武二年（1369）徙邊民於內郡。³² 洪武四年（1371），北元丞相驢兒屬下部衆萬餘人越界遊牧常峪（今張家口市橋東區常峪口村），明朝方面因當時仍缺乏有效經略邊界之能力，因此採取「詔令降附」的羈縻政策，默許蒙古勢力在元朝故地遊牧的事實。³³

然而隨著明軍於洪武二十一、二十四年間（1388-1391）數度重挫蒙古勢力，³⁴ 明太祖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誅殺藍玉（?-1393）等征蒙將領以鞏固皇權的同時，亦一改先前對蒙古的懷柔態度，命都督劉眞、指揮使李彬（1361-1422）等人巡視北疆，於宣德等處「度量城隍、增設險隘」。³⁵ 並隨即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於大同以東置萬全左右等十衛，用以「築城置兵屯守」。³⁶ 洪武二十六年萬全置衛後，在野狐嶺口南緣夯築土城（今張家口市萬全區萬全鎮），永樂二年（1404）將萬全右衛治所遷往此處，隔年並以磚塊包牆。³⁷ 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本人對於萬全城之基礎建設頗爲留意，永樂八年（1410）成祖親征塞北，曾特意向金幼孜（1368-1432）等隨行人員強調「此城朕所築」。³⁸ 洪武、永樂年間萬全城的發展，象徵明朝對於張家口周邊經略之濫觴。其後明朝在位於萬

32 (明) 尹耕，《兩鎮三關通志》，卷 3，頁 4-5，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12402117/>（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明) 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卷 25，頁 11b。關於明太祖的徙民政策，參：徐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 卷 2 期（1988.12），頁 179-190。

33 (明) 尹耕，《兩鎮三關通志》，卷 3，頁 8-10；(明) 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25，頁 12a。

34 (清)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327，頁 8464-8465。

35 (明) 尹耕，《兩鎮三關通志》，卷 3，頁 13-14；(明) 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25，頁 12a。

36 《明實錄·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六日，卷 225，頁 3295。

37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 1，頁 16，收入《中華古籍資源庫》，中國國家圖書館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4&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25260#（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湯羽揚主編，《中國長城志·建築》（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頁 704-708。

38 (明) 金幼孜，《金文靖公北征錄》，收入《紀錄彙編》（上海：涵芬樓，1938，據明萬曆沈節甫輯、陽羨陳于廷刊本影印），冊 9，卷 32，頁 6。

全城東北二十里處建立張家口堡，則進一步體現蒙漢交流下長城堡寨建設的發展。

張家口之名正式載入史冊，始於十五世紀張家口堡（今張家口市堡子里）之建立。³⁹ 清水河貫穿東、西連山（今名太平山）之天然隘口，係明代蒙漢交通之重要關卡，明代史料稱之為張家隘口。⁴⁰ 宣德四年（1429），於該隘口以南五里處築堡，即後人所稱之張家口堡，嘉靖《宣府鎮志》載其修築經歷：

張家口堡。高二丈五尺，方四里有畸。城鋪十，東南二門。宣德四年指揮張文築，成化十六年展築關廂一，高二丈，方五里。嘉靖八年指揮張珍築其屬堡，曰高廟莊、張家屯、高家屯、沈家屯、四角屯、馬家屯、水泉莊、武家莊、王家砦、老鴉莊、許家屯，共十有一。⁴¹

根據以上記載，自十五世紀前期建立後，張家口堡的佔地面積乃至周邊守備範圍，皆有所擴張。其主體最初為高二丈五尺（約 777.5 公分）、方四里（約 1.78 公里）多的軍事防禦建築，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至成化十六年（1480）時於主堡外增建關廂。張家口堡最初的居民，主要為明軍駐守官兵。根據正德《宣府鎮志》所載，十六世紀初期當地官兵已達一千餘名：「存籍官軍一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操備官軍七百八十九員名，雜差官軍四百一十員名。實有官軍一千七十八員名：操備官軍六百六十八員名，雜差官軍四百一十員名」。⁴² 在駐軍人數增長的背景下，嘉靖八年（1529）復增修屬堡共十一座。時人對張家口堡及其周邊防禦工事之地理認知，見於嘉靖二十年（1541）魏煥刊〈皇明九邊考·宣府邊圖〉。⁴³

十六世紀初張家口堡為因應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等需求，建有各類建築，正德《宣府鎮志》載：「張家口堡察院，在堡內北，成化十八年指揮胡璽建。官廳，在堡西北隅，宣德六年建。守備官公廡，在官廳西。張家口倉，在堡南隅。草場，在堡西北隅」。⁴⁴ 由此可見，宣德四年張家口建堡後，先於宣德六年（1431）在城內建造官廳，作為當地辦公衙署。此後隨著其堡寨規模的擴大，

39（明）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11，頁 17b。

40（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北京：綫裝書局，2003，據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影印），卷 3，頁 55b。

41（明）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11，頁 17b。

42（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5，頁 30a。

43（明）魏煥，《皇明九邊考》，卷 4，美國國會圖書館藏，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resource/lnclscd.2001708572.1A004/>（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44（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2，頁 48a。

亦在成化十八年（1482）建築察院，供巡按御史等來訪上級官員使用。至於張家口當地軍事長官都指揮僉事的守備官公廡，則毗鄰官廳。該堡亦設有糧倉、草場等戰備物資的存儲設施。在各級衙門館舍及糧草倉庫外，堡內亦有寺廟等宗教文化設施，如宣德年間首建真武廟，其後分別又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弘治五年（1492）搭蓋武安王廟、城隍廟等建築。⁴⁵

張家口堡周邊亦有各類軍事、交通設施，其城東有清水河橋，為其主要聯外通道之一。⁴⁶ 至於其周邊守備範圍，東起東高山臺，西至野狐嶺，地遠五十四里餘，在正德年間共有設有 47 座墩臺，守瞭官軍共 323 員；⁴⁷ 至嘉靖年間則發展為 50 座墩臺，守瞭官軍 360 員。⁴⁸ 作為與蒙古對峙的邊塞堡壘，張家口堡官軍配有馬 620 匹，⁴⁹ 堡外因應設有牧馬草場，地幅五頃五十畝。⁵⁰

上述基礎建設及官兵配置的擴充，體現張家口自十五世紀築堡後的發展，而此現象正與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明蒙關係的變化，息息相關。隨著張家口設堡，明廷上下逐步認識到當地對蒙古關係之戰略意義，並在擴建堡壘等基礎建設的同時，進行制度以及戰略上的討論。十五世紀三〇、四〇年代，蒙古瓦剌部先後在其首領脫歡（Toğan, ?-1439）與也先太師（Esen tayişi, 1407-1454）父子的帶領下迅速崛起，並且積極向歐亞大陸東部擴張。正統十一年（1446）明朝從哈密獲得情報，「聞也先將往斡兒者地面過冬」。⁵¹ 此處所謂「斡兒者」，乃明代漢文史料中「我着」（蒙 Üjiyen）之異稱，即兀良哈三衛中福餘衛之蒙古部名。聽聞也先東擴進軍的消息後，明朝兵部奏言：「也先無一日不欲南牧，事機已著，不可不為之備。乞勅文武大臣，會議方畧」。⁵² 明朝後續也於同年十月，再次確認也先攻打兀良哈三衛的後續情況，並作出相應處置。⁵³ 在瓦剌東擴的歷史背景下，張家口作

45（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3，頁 79a。

46（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3，頁 86a。

47（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3，頁 63b-64b。

48（明）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10，頁 36a。

49（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5，頁 37a。

50（明）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卷 4，頁 19a。

51《明實錄·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正統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卷 145，頁 2861。

52《明實錄·明英宗實錄》，正統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卷 145，頁 2861。

53《明實錄·明英宗實錄》，正統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卷 146，頁 2880；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卷 147，頁 2896。

爲明朝守衛長城北疆的重要堡壘，也被納入邊務討論中。正統十二年（1447）宣府總兵官楊洪（1381-1451）曾就邊務上書明廷，強調張家口及其周邊堡壘之邊防重要性：「宣府操備哨守等項，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新開口堡、野狐嶺關，最爲要害」。⁵⁴隔年也先即與明廷因互市爭議而交惡，瓦剌遂於正統十四年（1449）兵分四路攻打明朝，其中也先重臣阿剌知院（Alagtemür，?-1456）經獨石、馬營（今張家口市赤城縣獨石口鎮馬營溝一帶）一路進兵宣府，圍攻赤城（今張家口市赤城縣）。⁵⁵瓦剌此次入寇，促成明英宗（1427-1464，1435-1449、1457-1464 在位）決定親征蒙古，直接導致後來的土木堡之變。此項重大歷史事件，也體現張家口周邊作爲農牧文明衝突與交流熱區的顯著性質。

隨著十五世紀蒙古多次南下入邊，明朝內部對於張家口邊防體系的運作亦提出相關改革。成化十一年（1475）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殷謙（1417-1504）奏稱「萬全都司所屬沿邊城堡倉場，俱委軍職管理，積弊不可枚舉」，因此建請將張家口堡倉附於萬全之廣盈倉，並「增設官攢，定派所當，支給城堡」。這項分權防弊的建議，獲得明廷的批准。⁵⁶此後張家口堡之後勤補給，一改過往地方軍事將領兼管財政的往例，轉由專職管理堡倉之官吏負責。成化二十年（1484），在宣府管糧郎中汪洪建請於張家口堡倉以及草場，「添設大使、攢典各貳員」，獲戶部題准。⁵⁷張家口的財政管理緣此又獲得進一步的制度化。

成化十一至二十年間張家口堡倉制度的建立與細化，與蒙古各部勢力的南下發展，亦有所關聯。土木堡之變大敗明軍後，也先的勢力迅速擴張，終於明景泰四年（1453）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建元「添元」，然而隔年也先旋爲部下阿剌刺殺，此後蒙古諸部長期陷入多年混戰的分裂局面。⁵⁸十五世紀七〇年代，麥克零（Mekrin）部的亦思馬因（Ismayil，?-1486）隨其兄乜加思蘭（Beg Arslan，?-1479）自哈密、甘肅遷往河套。成化十五年（1479）亦思馬因弑乜加思

54 《明實錄·明英宗實錄》，正統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卷 158，頁 3087。

55 《明實錄·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卷 180，頁 3485-3486；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卷 181，頁 3532-3533。

56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成化十一年四月一日，卷 140，頁 2609。

57 （明）張學顏，《萬曆會計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九年（1581）刻本影印），冊 831-833，卷 23，頁 80。

58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頁 144-169。

蘭，得太師稱號，成爲蒙古右翼應紹不（Yüngšiyebü，亦作永邵卜）萬戶的領主，並且擁立年方七歲的達延汗（Dayan qağan，1473-1516，1479-1516 在位）即蒙古汗位，成爲蒙古高原上權傾一時的霸主。⁵⁹ 成化十六年（1480）十月，明廷根據情報，得知亦思馬因向東進兵兀良哈三衛，其盟友脫羅干同時逼近大同一帶。⁶⁰ 同年十一月，即有蒙古人入侵張家口一帶，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同知周玉（1438-1494）因而奏稱：「三路境內，俱有虜寇出沒，殺傷軍民。其張家口堡提調邊墩指揮盛英，管墩百戶劉鑑，守瞭不謹，當究其罪」。⁶¹ 可見亦思馬因主政時期，蒙古亦曾前往張家口一帶劫掠。

成化十九年（1483），達延汗在滿都海哈屯（Manduqai qatun，1448-1510）的輔佐下擊敗亦思馬因，逐步掌控蒙古政局，⁶² 同年亦思馬因敗走海西（青海）。⁶³ 在擊潰亦思馬因的同年，達延汗隨即積極南向，與明軍爆發一系列軍事衝突，以報成化十六年（1480）明軍於威寧海子一役襲擊蒙古營地之仇。⁶⁴ 對此明朝官方稱「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復讎，大同官軍大遭摧衄」。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化朝與達延汗的軍事對抗中，張家口堡持續發揮軍事防禦以及後勤補給的重要作用。如成化十九年明廷爲獎勵抵禦蒙古之邊防官員，朝廷頒發賞賜錄功，兵部稱「虜酋小王子勢方熾，（簡）顛等乃能以寡敵眾，少挫其鋒，亦可嘉尚」，而「供給芻糧郎中汪洪」正名列敘獎人員當中，⁶⁶ 而他正是前述建請完善張家口堡倉制度的該位管糧郎中。在明廷擴張經營張家口堡的同時，達延汗統治下的蒙古人，又於成化二十年入侵「張家口、野狐嶺諸處，攻圍墩臺，殺死官軍」。⁶⁷ 由此可見，明朝對張家口堡的修築與經營，與蒙古勢力的南向發展，二者間具有緊密關聯。

59 寶音德力根，〈應紹不萬戶的變遷〉，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續編）·歷史學卷》上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頁 394-436。

60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卷 208，成化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頁 3635。

61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卷 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六日，頁 3640。

62 萩原淳平，〈ダヤン・ハーンの生涯とその事業〉，收入氏著，《明代蒙古史研究》，頁 99-214；寶音德力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年 6 期，頁 1-9。

63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頁 398、442-448。

64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卷 240，成化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頁 4067-4068；卷 241，成化十九年六月十九日，頁 4078-4079；卷 242，成化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頁 4091-4092。

65 《明實錄·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40，弘治十一年八月十八日，頁 2430。

66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卷 246，成化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 4171-4172。

67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卷 253，成化二十年六月五日，頁 4276。

三、張家口馬市的開放

十五世紀上半葉，明朝基本對蒙古保持著武力對抗的態度。延續正德朝對蒙古的態度，嘉靖朝前期張家口一帶的戰略佈局，仍不時採取相對積極的反擊態勢，而非固守不出。如嘉靖十七年（1538），有蒙古「數千騎突入宣府張家口」，時任宣府鎮守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郝鑑「倉皇出師，反墮賊計」。⁶⁸在明蒙雙方關係持續緊繃的態勢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翁萬達（1498-1552）上書請求修築塞垣，並提議加強張家口一帶的邊防措施：「議以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為最衝」。⁶⁹與此同時，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1508-1582，1571-1582 在位）的勢力迅速崛起，儼然成為當時蒙古高原之霸主，並對中國的物產、技術產生高度興趣。十五世紀前期，俺答汗曾多次請求與明朝建立貿易關係，但均不果。然而蒙漢之間的交流趨勢，並未因嘉靖初年邊防政策而受到隔絕，反而日益發展。嘉靖九年（1530）、十二年（1533）明朝爆發大同兵嘩，事敗後不少漢人逃亡蒙古；此外，亦有相當數量之漢人邊民迫於生計，而私自移住關外。俺答汗遂將這些漢人收留，安置於豐州灘（今呼和浩特一帶）耕種營生。⁷⁰這些漢民將中原的物產、技術以及建築帶入蒙古地區，並且形成蒙古語稱為「板升」（baising，百姓）的土木結構平房聚落，成為後來土默特歸化城的發展基礎。⁷¹

嘉靖朝前期對蒙古施行「閉關絕貢」的政策，最終造成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大舉率軍叩關，一路從古北口越長城，兵臨北京城下，史稱庚戌之變。在俺答汗的要求下，明朝終於嘉靖三十年（1551）陸續於大同、宣府、延綏、寧夏諸鎮設立馬市。⁷²宣府馬市初於該年五月設於新開口堡，對此《明實錄》載：「宣府設馬市于新開口堡。虜酋把都兒、辛愛、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兒慎台吉凡五

68 《明實錄·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26，嘉靖十八年七月十八日，頁 4700。

69 （明）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10，頁 67。

70 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期の大同反亂とモンゴリア（上）——農耕民と遊牧民との接點〉，《東洋史研究》，30 卷 4 號（1972.3），頁 326-350；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期の大同反亂とモンゴリア（下）——農耕民と遊牧民との接點〉，《東洋史研究》，31 卷 1 號（1972.6），頁 64-81；薄音湖，《明代蒙古史論》（臺北：蒙藏委員會，1998），頁 111。

71 李華彥，〈「小王子」家族與歸化城土默特部的開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7 期（2017.6），頁 35-81。

72 侯仁之，〈明代宣山西三鎮馬市考〉，頁 198-206；胡凡，〈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衝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 年 4 期，頁 43-55。

部入市共易馬二千餘匹」。⁷³ 此次互市交易的領頭人物，主要是俺答汗之親故，如「把都兒」(Bağatur) 明代史料又作「老把都」，又號「昆都力哈」(Köndelen qağan)，即俺答汗之四弟伯思哈爾 (Bayisqal, 1510-1572)，為蒙古右翼應紹不萬戶哈刺慎部領主。⁷⁴ 「辛愛」(Sengge, 1522-1586) 即俺答汗長子，後繼其父為土默特部領主。「伯腰」(Bayan) 又稱「不彥台吉」，為俺答汗次子。⁷⁵ 「卜郎台吉」(Bodidara tayiji) 又名「我托漢卜只刺台吉」(Otqon bodidara tayiji, 1514-?)，為俺答汗六弟。⁷⁶ 「委兀兒慎台吉」為俺答汗三弟、兀慎部領主刺布台吉 (Labuğ tayiji, 1509-?)。⁷⁷ 明朝於新開口堡開市之舉，吸引哈刺慎、土默特諸部前來，一時造就蒙漢雙方的和睦往來，《萬曆武功錄》對開市之初的熱絡局面有生動描述：

上谷新開口堡市成，先是酋長把都兒、辛愛、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兒慎台吉，以市未有期，齋通事人酪酒十酋，及熟羊肉十腔，赤扇馬一匹，請期於太師，得二十三日，幸開市。是日，易馬凡三百餘匹，頃之印烙給緣邊卒。⁷⁸

然而這樣的友好局面未能長期延續，宣府開市不過一年有餘，明朝即在嘉靖三十一年 (1552) 九月，以蒙古不遵市約為由，關閉張家口馬市，《明實錄》載：

巡按直隸御史蔡朴上疏請罷宣府馬市。初大同馬市罷，宣府以虜守約，互市不絕。至是虜益驕，方張家口開市畢，次日即入常峪口肆掠，故朴謂宜罷。上曰：各邊開市，悉令禁止，敢有劾逆逮言者斬。⁷⁹

嘉靖帝決議閉關絕貢後，明蒙又重回武裝衝突，持續近二十年之久，期間戰事的頻率、規模，又較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⁸⁰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張家口又再度從經貿市場淪為邊境戰場，如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明廷獲報「虜從宣府張家口堡

73 《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卷 373，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頁 6663。

74 寶音德力根，〈應紹不萬戶的變遷〉，頁 416；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 302。

75 (明) 茅元儀，《武備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天啓元年 (1621) 刊本)，卷 206，頁 3。

76 (明) 蕭大亨，《北虜風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鈔本)，頁 24-25；寶音德力根，〈應紹不萬戶的變遷〉，頁 417-418。

77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 408。

78 (明)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7，頁 3。按：引文扇馬 (又作驕馬)，蒙古文稱 aḡta，指經去勢之牡馬，以其性情安穩，便於征戰操駕。

79 《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卷 389，嘉靖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頁 6845-6846。

80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頁 319-324。

入犯」。⁸¹ 直到隆慶四年（1570），蒙古右翼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Baga aci, 1553-1583）因婚配糾紛憤而投靠明朝，明蒙關係才意外出現轉機。⁸²

在得知把漢那吉來歸的消息後，宣大總督王崇古（1515-1588）等人認為此係與蒙古和談之良機，遂厚待之並遣歸蒙古。把漢那吉北歸不久，俺答汗旋遣使入謝，並有請求封貢之意，王崇古遂於隆慶五年（1571）初進〈確議封貢事宜疏〉，條陳議錫封號官職、定貢額、議貢期貢道、議立互市、議撫賞之費、議歸降、審經權以嚴邊備等八事，⁸³ 為俺答封貢奠定基礎，明蒙關係再次迎來轉機。⁸⁴

隨著隆慶帝批准王崇古所議，明朝將張家口作為明蒙互市據點之一重新開放，此外開放互市處尚有大同新平堡、得勝堡以及山西水泉營，共三鎮四處，各地每年開放互市一次。⁸⁵ 當時張家口方面主要是蒙古的應紹不萬戶來市，根據王崇古所報，雙方貿易數額如下：

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千九百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羸牛羊九千，撫賞費八百兩。⁸⁶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當時張家口馬市依其運營性質，主要分為官市與私市兩類。在進行次序上，原則為「官市畢，聽民市」。⁸⁷ 就貿易規模而言，隆慶五年蒙古在張家口官市出售馬匹數額為 1,993 匹，明朝官方對應交付馬價銀共 15,277 兩。此外，除官市馬匹交易外，明廷並向應紹不諸部頭人提供撫賞銀 800 兩。明朝對蒙古諸部之撫賞，始於明初與兀良哈三衛關係之建立，起初以入貢及馬市作為撫賞

81 《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卷 549，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三日，頁 8845。

82 薄音湖，〈把漢那吉的家庭糾紛〉，《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 卷 3 期（2001.5），頁 27-31。

83 （明）王崇古，〈確議封貢事宜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17，頁 1-20。

84 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変容〉，頁 197-255；胡凡，〈論明穆宗時期實現「俺答封貢」的歷史條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 年 1 期，頁 37-45。

85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 225。

86 《明實錄·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61，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頁 1493。

87 葉向高，〈寶顏堂訂正四夷考〉，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影印），輯 18 函 5，卷 7，頁 30。

之管道，至明中葉後則又發展出燒荒撫賞、歲賞與零賞等類型。⁸⁸ 換言之，隆慶五年明廷撥給應紹不諸部的撫賞銀，其治理邏輯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明初以降遼東馬市撫賞的借鑒與轉化。

與大同、山西二鎮的其他三座馬市相比，張家口作為後宣府鎮的馬市口岸，其官市馬數及馬價銀排名第二，佔明蒙互市總額四分之一強；至於張家口的私市牲口數量更是佔據首位，佔互市總額逾四成，其對於明蒙關係之重要性，可見一斑。詳細數據見下表：

表一 隆慶五年三鎮四地市額⁸⁹

	官市馬數	馬價銀兩	私市馬羸牛羊數	撫賞銀兩
張家口堡	1,993	15,277	9,000	800
得勝堡	1,370	10,545	6,000	981
新平堡	726	4,253	3,000	561
水泉營	2,941	26,400	4,000	1,500
總額	7,030	56,475	22,000	3,842
張家口堡佔比	28.35%	27.05%	40.91%	20.82%

隨著隆慶議和的推進與持續，明蒙互市獲得進一步發展。隆慶六年（1572）蒙古再度來市，方逢時（1522-1596）曾錄該年貿易額度：「隆慶六年互市，宣府鎮因老把都諸子未到，止易過永酋夷馬九百二匹；大同鎮易過馬四千五百六十五匹；山西鎮易過馬二千三百七十八匹」。⁹⁰ 因應紹不萬戶頭人老把都·伯思哈爾及其諸子該年並未前往張家口堡互市，故當次宣府鎮的貿易規模顯著下降。然因大同鎮得勝、新平二堡市額總數則相對上升，故三鎮市馬匹數及馬價銀總數不減反增，對此《萬曆會計錄》載：「(隆慶)陸年覆兵部等衙門會議，撫賞銀兩如果不足，每鎮再動節餘客餉銀各壹萬兩，彼時參鎮互市馬不過柒千餘匹，共費銀止陸萬兩」。⁹¹ 此後三鎮馬市的分類、運作及經費，在實際運行中逐步形成相關規範。

88 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頁 1-69。

89 《明實錄·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卷 61，頁 1492。

90 （明）方逢時，〈為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20，頁 5。

91 （明）張學顏，《萬曆會計錄》，卷 23，頁 55。

官市由明朝官方經營，以兵部太僕寺常盈庫作為主要馬價銀，佐以戶部邊鎮客餉銀乃至地方邊鎮自籌朋合銀，用作向蒙古購馬的市本與撫賞銀；私市則在遵循官方規範的前提下，開放民間商人與蒙古互市。⁹²

張家口等馬市的開放，使得蒙古諸部在俺答汗的約束下，不再侵擾明境。與此同時，明朝官員亦試圖對互市時間、地點及規模進行討論。隆慶六年王崇古代俺答汗請乞四事，提及不時有蒙古牧民前來邊口，提出以牛、羊、鹽、柴、皮毛、馬尾諸物，向明朝方面換取米、豆、雜糧的需求。故王崇古建請在三鎮常市之外，不時於邊塞加開小市，⁹³ 然而明廷朝臣有人對王崇古的建議抱持不同甚至反對意見。如同年巡按直隸御史孫綜（1539-1594）奏：「俺荅等貢市已完，華夷安靖，並無諍爭……明歲貢市，須與俺荅講定，仍在春末，自得勝、新平、張家口三堡外，不得另開市場。仍令俺荅鈐束諸酋，不致違約」。⁹⁴ 惟此後明蒙互市的發展，並未如孫綜所請，局限在得勝、新平、張家口三堡，反而進一步擴張，從而有所謂大市、小市的新設。所謂大市者，例同隆慶五年所開四市，每歲一次；至於小市，則每月一至二次，並無宴賞。至於大、小市的增置，主要集中在大同一鎮。是以大同鎮在既有得勝、新平二堡常市之外，復增守口堡大市一處，以及助馬、寧虜、殺胡、雲石、迎恩、滅胡六堡小市。至於山西鎮則於水泉營外，增設老營堡大市一處。⁹⁵ 相較於大同、山西二鎮的變化，宣府鎮則仍以張家口堡為唯一常市，並未另設大、小市。⁹⁶ 因此宣府一鎮市馬之額，持續集中在張家口一堡，從而帶動其經濟規模之擴張。

隆慶議和以後至萬曆朝，明蒙互市規模迅速增長，其中以張家口堡所代表的宣府鎮官市尤甚。萬曆二年（1574）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方逢時〈為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曾記載該年官市市馬規模成長之鉅：「今照（萬曆）二年市馬，在宣鎮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而每月諸酋

92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頁 265-268；吳兆慶，〈明後期宣大山西三鎮馬市市本來源考述——兼述撫賞銀在市本中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 年 5 期，頁 44-55。

93（明）王崇古，〈酌許虜王請乞四事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18，頁 10；《明實錄·明穆宗實錄》，卷 70，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頁 1686-1687。

94 《明實錄·明穆宗實錄》，卷 5，隆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頁 199。

95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 230-232。

96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 226。

送易之馬、不在其內、通計三鎮幾二萬七千有餘」。⁹⁷ 相較於隆慶五年三鎮首次官市馬匹交易總額不過 7,030 匹，僅僅三年過後變已翻漲為 27,000 餘匹；其中宣府鎮市馬更是從 1,993 匹，暴增至 14,500 餘匹，成長幅度達七倍之強，甚至超越山西、大同二鎮市馬總額。由於宣府鎮所購得馬匹，已遠超該地邊防將士以及朝廷所需，故在宣大總督王崇古等人題請下，明廷於萬曆二年批准「每年薊鎮督撫發銀一萬二千兩，于宣府易買馬一千二百匹」。⁹⁸ 在代薊鎮市馬政策的推波助瀾下，此後以張家口堡為核心的宣府官市更是發展迅猛，⁹⁹ 在萬曆三年（1575）市馬數量達到 18,000 餘匹。¹⁰⁰

張家口馬市的開放，使得該地從蕭瑟的邊防堡壘，逐步發展成初具規模的明蒙市集。萬曆六年（1578）巡按直隸御史黃應坤（1532-?）在奉命出關巡查宣大二鎮後，曾向朝廷匯報邊地社會的繁榮安定，其稱：

官民城堡次第興修，客餉日積于倉廩，禾稼歲登于田野，凡此孰非款貢之利哉……又如近日張家口虜諱被創，竟隱忍以畢市而去，此其不欲渝盟以自失其厚利有明徵矣……以宣鎮之大數言之，方互市之初，虜馬不及二千匹，今歲已市者三萬五、六千矣。迨及歲終當不下四萬。¹⁰¹

由此可見，根據黃應坤的觀察，可知明廷所提供市賞的經濟誘因，提高了蒙古人背約犯邊的機會成本，從而達到有效安穩邊防的效益。然與此同時，明朝亦不得不面對市馬歲增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其中尤以宣府官市增幅最大，從隆慶五年的 1,993 匹，激增至萬曆六年的 36,000 匹，在明蒙開放通市的七年內，漲幅幾達 18 倍。

此後明廷為擲節張家口市費，遂試圖於萬曆七年（1579）將宣府限制在 30,000 匹。¹⁰² 此項限制一直延續至萬曆十六年（1588），時任兵部尚書鄭雒（1530-1600）奏請節省市費之議，以「大都宣府馬數以二萬匹上下，不得踰三

97（明）方逢時，〈為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20，頁 5。

98（明）方逢時，〈為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20，頁 9；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卷 153，頁 2139。

99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 233。

100（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 153，頁 2139。

101《明實錄·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萬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卷 79，頁 1702。

102《明實錄·明神宗實錄》，萬曆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卷 83，頁 1751-1752。

萬」，¹⁰³ 試圖進一步規範限縮張家口官市馬匹數額。然而到萬曆十九年（1591），宣府市馬最終仍躍升至 36,000 匹，在規模上遠遠超越大同、山西二鎮馬市，成為明蒙雙方主要的貿易口岸。¹⁰⁴ 通檢《明實錄》、《明會典》、《萬曆武功錄》、《明經世文編》等史料，可輯出萬曆朝歷年三鎮官市馬匹交易數額之記載，表列如下：

表二 明萬曆朝歷年官市馬數

官市馬數	萬曆元年 ¹⁰⁵	二年 ¹⁰⁶	三年 ¹⁰⁷	六年 ¹⁰⁸	七年 ¹⁰⁹	十六年 ¹¹⁰	十九年 ¹¹¹	增幅
宣府鎮	7,810	14,500	18,000	36,000	30,000	20,000	36,000	461%
大同鎮	7,505	7,670	10,000	闕	闕	14,000	15,500	207%
山西鎮	3,988	5,000	6,000	闕	闕	6,000	闕	150%

對應宣府官市交易馬匹數額以及蒙古來使數目的增長，明朝於張家口所支付的馬價銀以及撫賞銀開銷亦大幅增加。相較於隆慶五年明廷在張家口向蒙古應紹不諸部支付馬價銀 15,277 兩及撫賞銀 800 兩，萬曆年間的馬價銀與撫賞銀皆有顯著的上升。據萬曆二十七年（1599）宣府巡撫王象軋（1539-1630）奏稱，當年明

103 《明實錄·明神宗實錄》，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十三日，卷 200，頁 3751-3752。

104 《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238，萬曆十九年閏七月七日，頁 4407；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頁 4468-4469。

105 《萬曆武功錄》：「（萬曆）元年，宣府凡七千八百一十四，大同凡七千五百五匹，山西凡三千九百八十八匹。」（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冊 436，卷 8，〈俺答列傳下〉，頁 472。

106 方逢時〈爲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今照（萬曆）二年市馬，在宣鎮已一萬四千五百有餘，在大同約七千六百七十有餘，在山西約五千有餘。」（明）方逢時，〈爲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20，頁 5-6。

107 《大明會典》：「（萬曆）三年議准，宣大山西三鎮互市夷馬，每年大約宣府以一萬八千匹爲率，用貨價銀一十二萬兩；大同以一萬匹爲率，用銀七萬兩；山西以六千匹爲率，用銀四萬兩。」（明）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 153，頁 2139。

108 《明神宗實錄》：「以宣鎮之大數言之，方互市之初，虜馬不及二千匹，今歲已市者三萬五、六千矣。迨及歲終當不下四萬。」《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79，萬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頁 1702。

109 《明神宗實錄》：「兵部題覆宣大督撫吳兌等疏，大約謂青、永二酋并市，宣府一鎮所市馬三萬匹，較之初議已踰數倍。」《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83，萬曆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頁 1751。

110 《明神宗實錄》：「大都宣府馬數以二萬匹上下不得踰三萬，大同一萬四千，山西六千如數。」《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200，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頁 3752。

111 《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九年七月庚午：「宣鎮市馬萬曆三年報一萬八千匹，銀一十二萬兩，乃歷年遞至三萬六千匹，長此安極？」又同書萬曆十九年九月戊寅條載：「兵部覆閱視大同少卿曾同亨題稱：該鎮市馬一萬五千五百匹額銀十萬爲準，撫賞銀以二萬二千兩爲準。」《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238，萬曆十九年閏七月七日，頁 4407；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頁 4468-4469。

朝在張家口向蒙古支付馬價銀為 113,913.8 兩，撫賞銀則為 44,695.9 兩。¹¹² 至萬曆四十年（1612）宣大總督涂宗浚（1555-1621）則疏稱：「查撫賞馬價之費，在宣府則撫賞五萬二千兩，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兩；在大同則撫賞二萬二千兩，馬價十萬兩；在山西則撫賞一萬四千兩，馬價四萬兩」。¹¹³ 由此可見，宣府鎮在張家口一市所支付的馬價銀與撫賞銀，至萬曆四十年已分別高達 185,000 兩及 52,000 兩，其金額甚至遠超過大同、山西二鎮各大小馬市之總合。由此足見隨著隆慶議和後明蒙關係的推進，促使張家口堡迅速崛起，爾後亦帶動當地市圍等基礎建設的開展。

四、明蒙關係下張家口堡基礎建設的發展

承前所述，有關萬曆年間張家口市馬數、馬價銀與撫賞銀的膨脹原因，除了宣府代薊鎮市馬的制度性影響外，根本上仍是由於張家口堡溝通華北平原與張北草原農牧社會的重要區位。更具體的來說，十六世紀宣府口外蒙古右翼應紹不萬戶的壯大，其經濟需求在隆慶議和後推動張家口堡從一小型邊防軍事堡壘，躍升成為明蒙間主要互市口岸，從而帶動當地基礎建設的營造。

對於隆慶議和後張家口的顯著崛起，萬曆二年方逢時便已明確指出宣府市馬所以遠超山西、大同等其他明蒙邊貿口岸，原因在於張家口外遊牧諸部之蕃盛：「查得宣府以一鎮而當永邵卜、青把都二部之夷，故市馬比山、大獨多一倍」。¹¹⁴ 此處的永邵卜、青把都二部，即蒙古右翼應紹不萬戶下的應紹不與哈刺慎（qaracin）二部，其中前者當指應紹不萬戶領主永邵卜大成台吉（Yüngšiyebü dayicing tayiji, ?-1596）屬部，後者則為哈刺慎部主青把都兒台吉（Cing bağatur tayiji, ?-1591）屬部。至於萬曆六年黃應坤提及互市對維繫明蒙關係的重要性時，亦強調宣府口外蒙古諸部勢力之強盛與張家口市馬歲增之關聯：

臣故知虜之無異志也，但犬羊之性，惟事貪求，市馬歲增無所厭足。此雖二鎮之所同，而宣府為甚。蓋在大同以一鎮而當俺酋之一大枝，雖黃、捲

112（明）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卷 31，頁 1892。

113（明）涂宗浚，〈請嗣封爵以順夷情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449，頁 13。

114（明）方逢時，〈為懇乞議處疏通市馬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20，頁 10。

父子素稱桀驁，然市馬之所增歲猶不過數百匹，故尚可以勉強支吾。在宣府以一鎮而當青、永之两大枝，而又有獨臘台吉、打刺明安二小枝及夷婦太松等諸酋。部落既多而青酋諸兄弟又皆強悍難馴之虜，七、八年來市賞之增亦極矣。¹¹⁵

除了被稱為「青、永之两大枝」的哈刺慎、應紹不部二部外，當時前來張家口市馬者尚有「獨臘台吉、打刺明安二小枝及夷婦太松等諸酋」。此處所云獨臘台吉 (Duraqal taiji)，明代史料又作都臘兒台吉，隸屬察哈爾萬戶察罕塔塔爾部。¹¹⁶ 打刺明安 (Dara minggan)，即蒙古左翼察哈爾萬戶浩齊特部莫蘭台吉 (Molan tayiji) 之營名。¹¹⁷ 此二部察哈爾主要游牧於在張家口迤東迄獨石口邊外，與青把都所領哈刺慎部毗鄰。至於夷婦太松，則為青把都之姐，她在哈刺慎部具有崇高政治地位，曾主導該部與明朝互市。¹¹⁸ 要言之，可見當時前往張家口市馬之蒙古人，主要分屬應紹不與察哈爾萬戶，而就勢力而言又以前者為大宗。前往張家口交易的蒙古諸部來源多元、人口繁盛，儼然超過大同口外的土默特俺答汗及其子孫辛愛黃台吉、撻力克 (Cürüke, ?-1607) 所轄部眾，是以曾長期實地視察口外的黃應坤認為，這是宣府市馬數目超越大同的主要原因。

作為明蒙互市的重要據點，十六世紀下半葉以後，明朝對於張家口周邊基礎建設的經營，有顯著的發展。對此萬曆三十一年 (1603) 楊時寧 (1539-1609) 等人纂成《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為後世史家認識張家口堡沿革發展，提供珍貴的文字以及圖像史料。現存《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版本甚多，據筆者考證，其底本乃絹布彩色精寫本，現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又題《九邊聖跡圖》，分天、地、人三冊，通稱秘閣本。¹¹⁹ 此版圖文最詳，爾後有所刪節，以刻本的形式廣為流通，或單行，¹²⁰ 或收入《皇明世法錄》等政書之中。¹²¹ 比較《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諸版

115 《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79，萬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頁 1702。

116 烏雲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 125。

117 寶音德力根，《應紹不萬戶的變遷》，頁 420。

118 (明) 張佳胤，《建修獨石三城碑》，收入 (明) 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 339，頁 12；(明) 鄭汝璧，《由庚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冊 1356-1357，卷 37，頁 8。

119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東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 (1603) 彩繪本)。

120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 1。

121 (明)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刊本)，冊 17，卷 62。

本，可以發現傳世刻本明顯係根據秘閣寫本之圖文內容刪改而成。其中關於張家口之圖幅，秘閣寫本中主要有〈宣府分守口北道轄上西路總圖〉，¹²² 傳說刻本改題作〈宣府守道轄上西路總圖〉。¹²³ 此外寫本、刻本均收〈張家口堡圖〉，繪有許多關於張家口堡及其周邊地區資訊，為考察萬曆年間該地基礎建設之發展提供重要線索，尤其是彩色精寫本提供許多圖像細節，可與文字史料相參照。¹²⁴

秘閣本〈張家口堡圖〉繪有張家口本堡建築，其堡體有東、南二門，與嘉靖《宣府鎮志》之文字描述相符。¹²⁵ 此外，圖中城堡牆體為青灰色，用以表示磚造建築，該圖說稱：「本堡築於宣德四年，成化、嘉靖間俱展修之。至萬曆二年（1574）始包以甃，周四里，高三丈五尺。兩山中斷，因平地為牆以續之」。¹²⁶ 通過比對《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與嘉靖《宣府鎮志》的圖文記載，可以體現十五至十七世紀初期張家口堡之建築不斷持續發展的趨勢，自宣德迄萬曆朝，其主堡的高度由二丈五（約 878 公分）增高為三丈五（約 1,089 公分），並且由最初的夯土築城衍生出外部包磚的結構，在建築高度以及防禦強度上有所提升。至於萬曆初年張家口堡體建築的補強，在既有夯土結構外進行包磚，體現隆慶議和後與蒙古的關係雖然暫時和緩，明朝方面不僅並未放棄北疆的軍事準備，反倒趁機修築強化防禦工事，實際上反映明朝在張家口經營互市，主要將其視為一種撫夷的羈縻手段，其主要目的並非為了追求雙邊的經濟利益。要言之，對明朝官方而言，張家口實際的主要職能仍是防禦大於貿易，這也體現萬曆六年黃應坤出關巡視，強調「官民城堡次第興修」的歷史背景。¹²⁷

除堡體建築的補強工程外，隆慶議和後張家口亦因明蒙貿易而於當地興建馬市、撫夷廳等建築。據秘閣本《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張家口堡主體東北角往北延伸，沿清水河西岸築有狹長的城垣，連結撫夷廳乃至馬市，基本體現出隆慶五年俺答奉貢以後迄萬曆三十一年間，張家口馬市等基礎建設向北發展之情況。¹²⁸

122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 三鎮圖說》(東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冊天，頁 6。

123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 1，頁 14a。

124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 三鎮圖說》，冊天，頁 13；(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 1，頁 17a。

125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 三鎮圖說》，冊天，頁 13；(明) 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卷 11，頁 17b。

126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 三鎮圖說》，冊天，頁 6。

127 《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 79，萬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頁 1702。

128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 三鎮圖說》，冊天，頁 6。

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以後成圖之《九邊圖·第五宣府鎮圖》（圖1），亦繪有張家口堡以北往長城隘口處，建設撫夷廳與馬市之情況。¹²⁹ 關於萬曆朝張家口馬市北移的時間點，過去因史料闕如，學界長期未能定論，侯仁之曾稱：「然市場究於何時始自舊堡移至隘口，則失考矣」。¹³⁰ 惟據上引秘閣本《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九邊圖》，可以推斷最遲於十六世紀九〇年代，張家口馬市地點已於本堡向北移至毗鄰長城隘口處。

另一方面，秘閣本《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在張家口馬市北接長城邊牆以北處，則繪有張家口外游牧蒙古男婦、孩童、牲口以及氈房等生活情況，並分別標注其部落名稱，用以記錄與張家口通市之蒙古諸部。如秘閣本〈宣府分守口北道轄上西路總圖〉馬市邊牆以北外，標有「歹成倘不浪駐牧」，¹³¹ 此人即永邵卜大成台吉，乃卜只刺台吉長子，後繼其父成爲應紹不萬戶領主。¹³² 沿清水河往東北過東、西連山隘口，則有「青把都駐牧」，此人即青把都兒台吉，爲哈刺慎部主伯思哈爾之次子。至於西北方新開口堡外，則有「毛明暗台吉」（Muuminggan tayiji），此人即土默特部擗力克之三子，爲辛愛黃台吉之孫。至於秘閣本〈張家口堡圖〉，則又有「把都兒」、「青把都兒」以及「合羅氣」等部落首領名稱。除了「青把都兒」即同前文「青把都」外；「把都兒」應爲老把都，即伯思哈爾；「合羅氣」（Qoloci）又名啞速火落赤把都兒，爲卜只刺台吉三子。¹³³ 此外，秘閣本〈張家口堡圖〉中獅子屯以西處，有一位受到衆人圍繞而端坐的女性蒙古領袖，此人當爲哈刺慎部青把都之姐、曾在明蒙互市中扮演要角的太松。¹³⁴

值得注意的是，秘閣本所收〈宣府分守口北道轄上西路總圖〉與〈張家口堡圖〉中，重複出現「青把都」與「青把都兒」，然其游牧地卻分別出現在距離張家口不同方位，這應是反映這兩份圖幅，係根據不同時期的底圖轉繪而成，而此間青把都兒台吉的游牧地有所遷移。此外，稍晚形成的刻本中，亦出現這類蒙

129 〈九邊圖·第五宣府鎮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0850。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all?@@2002937367>（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130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226。

131（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天，頁6。

132 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頁30-31。

133（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天，頁13。

134（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天，頁13。

古部落標方位遷移的現象，如刻本〈宣府守道轄上西路總圖〉中，¹³⁵有七慶把都兒、合羅氣部落駐牧在清水河東岸。七慶把都兒（Secen bagatur）爲卜只刺台吉次子也辛跌兒之次子，又因其爲巴爾忽鄂托克之主，故又有巴爾忽台吉的稱號。嘉靖三十八年（1559）俺答汗前往青海擄掠番人，爾後將巴爾忽台吉一部留在當地。¹³⁶萬曆年間鄭維嘗謂：「把爾戶者，永邵卜之部落也。永邵卜世牧宣大絕塞，其族甚大，開市於張家口，惟把爾戶流寓青海，年久不歸。所領達子、所收番子，共有萬餘」。¹³⁷然而七慶把都兒即便在移住青海後，其部衆仍與張北草原的應紹不萬戶本部保持聯繫，並從青海前來張家口外與明朝互市。¹³⁸另一方面，通過交叉比對〈宣府守道轄上西路總圖〉刻本與〈張家口堡〉寫本，¹³⁹可以發現兩圖中的合羅氣部落分別位於張家口之東北與西北方，跨越清水河且相去甚遠。由此可以推斷，這兩份圖幅的底圖形成於不同時間，期間合羅氣部落曾分徙於清水河東西岸。

通過比較爬梳《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所錄相關圖文史料，不僅體現隆慶議和至萬曆三十一年間張家口的堡體建築、撫夷廳與馬市等基礎建設的擴建，同時亦能動態地考察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游牧於張北草原的蒙古社會在與明廷互市的歷史背景下而產生的遷徙情況。隨著明蒙通市的發展，張家口的規模獲得顯著發展，尤其是位於堡體北方的馬市，逐漸因明蒙間的經濟往來而崛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巡按宣大御史湯兆京（1565-?）訪察位於張家口主堡以北的馬市及撫夷廳一帶，賦詩〈題枕夷亭〉一首，其詩序對於當地地景形勢有頗爲生動的描寫：

乙巳春，登張家口市城、撫夷城，介兩山中，河流瀼瀼絕辟，下跨之梁，以東抵壁穴，壁貯哨卒，縻綆而登；西敞以亭，外瞰則保塞諸夷列帳其下，內瞰則膏野沃壤，畝可五、六金。噫！此三十年前戰場也，令人有安

135（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1，頁14a。

136 薄音湖，《蒙古部落的歷史變遷（元明時期）》（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20），頁156。

137（明）鄭維，〈敬陳備禦海虜事宜以弭後患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405，頁15。

138 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頁30-31。

139（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1，頁14a；（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冊天，頁13。

危倚伏之屢焉。¹⁴⁰

根據以上描述結合秘閣本〈張家口堡圖〉，可見當時馬市及撫夷廳分別稱作市城、撫夷城，東鄰清水河，河對岸為山壁，有兵丁駐守；至於市城西面則相對和緩，建有亭子可以瞭望，北眺為游牧部落，南面則為農業聚落。湯北京在臨望張家口和平互市之際，亦不忘隆慶以前明蒙衝突舊事，興發居安思危、禍福倚伏之感。

萬曆年間明蒙互市的延續，使得張家口堡以北、臨近長城隘口的馬市市城逐漸發展。萬曆四十一年（1613）宣府巡撫汪道亨（?-1618）至張家口堡北部的馬市巡視，發覺市城西面依山而建，惟其東南臨清水河，地勢平坦，有待加強建設堡牆，遂於該處修築堡壘，翌年而成，命名為來遠堡，並勒石為記，其於〈張家口新築來遠堡記〉中，對於新修內外建築有詳細描述：

堡牆東南二面，並西垣接聯舊城，四正曲直，沿長一百四丈四尺，平高三丈，上加女牆，五尺下掘底壘石為基，加甃甃其上……環堡四隅為戍樓者各一，內為公署者二，為營房者三百，為祠廟者二，為八角亭者一，為棹楔于衢者一。外撫賞廳三，楹觀、市廳二所，司稅房二十四桁。¹⁴¹

北面臨近長城隘口的馬市，發展為來遠堡，又稱上堡；至於南面的舊堡，則稱下堡。延續至清代以降的張家口上下二堡格局，由此正式形成。¹⁴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直隸宣府鎮輿圖》（圖2）¹⁴³ 及《宣府鎮圖本》（圖3）¹⁴⁴，基本體現十七世紀初期晚明的行政區劃。二者皆繪有來遠堡與張家口堡之相對位置，其中前者並以文字標注「來遠堡市圍，在張家口北五里」，並以紅色虛線與土黃色條塊，分別標示上下堡間的聯結道路及夯土牆垣（今張家口市區明德街），吻合汪道亨所云來遠堡「西垣接聯舊城」。

140（明）湯北京，〈題枕夷亭〉，《靈麓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2，據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冊98，卷7，頁665。

141（清）左承業纂修，《萬全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道光刻本），冊4，卷8，頁8-9。

142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頁226。

143 《直隸宣府鎮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21600。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bk-doc.npm.edu.tw/npmpc/npmpall?ID=58&SECU=234679592&PAGE=rbmap/mapdb/2ND_mapdb&VIEWREC=mapdb:1@@586718113#JUMPOINT（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144 《宣府鎮圖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21350。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bk-doc.npm.edu.tw/npmpc/npmpall?ID=58&SECU=234679592&PAGE=rbmap/mapdb/2ND_mapdb&VIEWREC=mapdb:11@@767804274#JUMPOINT（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根據上述圖文史料，可知自隆慶議和後，張家口的基礎建設因當地進行明蒙互市而獲得擴建。尤其在十六世紀末，位於張家口舊堡以北五里毗鄰長城隘口處，因經濟因素建成馬市，並於其後獲得顯著發展，奠定萬曆四十二年新建來遠堡的基礎，形成上下二堡格局。從而使得張家口從十五世紀的小型邊堡，最終躍升成為十七世紀初的通市要津，除擴建具有政治軍事功能的公署、戍樓、營房外，更新修撫賞廳、司稅房、祠廟等因應經濟文化需求的建物。故《皇明世法錄》稱張家口「乃全鎮互市之所，堡離邊稍遠，恐互市不便，乃甃垣其口。每遇開市，朝往夕還，臺高樓聳，關房嚴密，巍然一巨觀焉」。¹⁴⁵ 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張家口，雖因互市貿易獲得發展，然在明朝的九邊體系中，其主要定位仍在於軍事防禦，至於互市則乃附加之羈縻手段。隨著明朝邊防問題的困境而遭遇一連串的挑战，與此同時，遼東建州女真的崛起以及塞外滿蒙關係的變化，亦使得作為邊疆市場的張家口被賦予情報資訊樞紐的地位。

五、邊防問題、滿蒙情報與跨境資訊

神宗朝中後期，明朝由於巨額邊防支出引發一系列國家財政問題；加上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1600）於寧夏、播州及遼東爆發一連串邊疆軍事活動，史稱「萬曆三大征」，嚴重耗損戶部太倉銀與兵部太僕寺銀之庫存。¹⁴⁶ 為開拓財源以解燃眉之急，萬曆二十四年（1596）神宗以「助大工」為由，派遣中官前往各地收取各類雜稅，其中又以礦稅尤甚。¹⁴⁷ 此後萬曆二十五年（1597）紫禁城三殿因雷擊失火，迫使朝廷更是想方設法從民間增收稅款。在此歷史背景下，萬曆二十七年（1599）錦衣衛上後所百戶劉思忠、柳勝秋等人，建請從畿輔一帶徵收商稅，並從宣府選獻名馬，以助大工。¹⁴⁸ 時任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兼理糧餉的梅國楨（1542-1605），因此上疏請求邊情緊要，勿於張家口加收商稅，尤其擔心所派稅使

145（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 82，頁 9b。

146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陳宏文，〈明萬曆三大征軍費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147 田口宏二郎，〈畿輔礦稅初探——帝室財政、戶部財政、州縣財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20-31；邱仲麟，〈明代的煤礦開採——生態變遷、官方舉措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清華學報》，新 37 卷 2 期（2007.12），頁 361-401。

148（明）汪應蛟，《撫畿奏疏》（明刻本），卷 2，頁 1-9、卷 3；《明實錄·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卷 332，頁 6137。

激起蒙古與邊民之不滿，其稱：

查得本鎮所屬張家口堡，設在絕徼，極目荒涼，諸物不產。自隆慶五年，北虜歛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倘權稅之使，一或委用匪人，秉性顛蒙，毫釐必較，萬一激成他變，關係匪輕，相應亟請停止。¹⁴⁹

足見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張家口地方官員已與朝廷中央，在稅權問題上發生矛盾。而到了崇禎朝，張家口的財政與邊防問題，則又日趨嚴重。

十七世紀前期，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Ligden qaġan，1592-1634）迅速崛起，先於天啓七年（1627）消滅土默特順義王卜失兔，復於崇禎元年（1628）年擊潰應紹不萬戶。在消滅蒙古兩大部落後，林丹汗儼然有統一蒙古之態。挾其軍勢，林丹汗遂於崇禎二年（1629）三月遣使明廷，宣告在其原有的遼賞額度外，要求繼承土默特卜失兔的賞賜額度，並要求額外增給新賞每年八萬一千兩。面對林丹汗的漫天索要，朝廷上下是戰是和，一時未有共識。¹⁵⁰崇禎帝在朝廷財政吃緊的情況下，緊急召集撫臣商討對策。根據史語所藏《崇禎朝諭對錄殘本》，思宗本人與朝中眾臣曾就察哈爾、土默特以及應紹不等蒙古諸部要賞問題，及其所造成的財政缺口，進行詳細的討論。崇禎帝首先發難：「遼東移賞及卜、永二酋及市賞等項，所費太多，國家物力有限，如何應得？」¹⁵¹會議的癥結點在於是否姑息林丹汗的擴張政策，並答應其索要之新賞。¹⁵²關於林丹汗擊敗卜失兔與應紹不後，是否能繼承其過去之賞賜，崇禎帝抱持反對意見：「卜邵二酋既被搃趕去，賞他無名，不可輕易與他」，並且要求撫臣作好備戰應對。¹⁵³崇禎二年九月，朝廷旋接兵部塘報稱：「插漢兒王子為朝廷不與遼賞，惱恨至極，必要帶領兵馬，進邊親講」。而後緣有喇嘛僧暗中調停，林丹汗方才放棄攻打明朝之打算。¹⁵⁴

由於林丹汗的威脅，明朝對張家口的布防也愈加重視，並具體反映在修築城

149（明）梅國禎，〈請罷權稅疏〉，收入（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452，頁14-15。

150（清）汪楫，《崇禎長編》，崇禎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卷19，頁1181。

151（明）莊際昌，《崇禎朝諭對錄殘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末鈔本），頁42。

152（明）莊際昌，《崇禎朝諭對錄殘本》，頁42-55。

153（明）莊際昌，《崇禎朝諭對錄殘本》，頁47。

154（清）汪楫，《崇禎長編》，崇禎二年九月十六日，卷26，頁1493。

垣等防禦工事上。是以崇禎二年（1629）七月二十三日兵部題請修築邊城之經費：

西北張家口等六堡，約長百餘里，估定丈尺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八丈三尺，計工筭費尚該料物銀四萬二千九百四十三兩五錢零；口糧六萬四千一百二十一石四斗七合零，而庫藏如洗，無可搜括……奉聖旨：宣鎮修邊急需工費，這應補馬價銀二萬兩，准先措發濟用。¹⁵⁵

根據這份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中的兵部題本，可知當時朝廷經濟已不甚寬裕，至於張家口地方官府更是自稱「庫藏如洗，無可搜括」。張家口邊務財政吃緊，與中央屢次拆借市馬款項有關。天啓七年（1627）、崇禎元年（1628）中央兩次通過張家口向蒙古市馬，由宣府分別先代墊兩次款項，然而太僕寺卻無法立刻償還所積欠之二萬兩白銀。¹⁵⁶ 待宣府因林丹汗威脅在即，亟需款項修築邊城時，朝廷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補上先前欠款馬價銀，用以支付地方防禦工事之開銷。

在面對中央財政的困境以及邊防，張家口地方官員為修築張家口防禦工事，曾有自發捐款並向鄉里集資修築城牆的行動。崇禎十三年（1640）七月間，張家口部分城垣曾因雨坍塌，然而當時在哈刺慎蒙古將來張家口互市，遼東方面又蠢蠢欲動，因此在內中軍盧志德的發起下，宣大總督陳新甲（?-1642）及其手下官員與鄉里人士曾共同捐資修築張家口城垣。¹⁵⁷ 而地方官員集資修築張家口城牆的案例，也反映出晚明中央財政告急時，地方督府與鄉里社會的能動性。

在邊務財政吃緊與防禦工事維修困難的同時，張家口的明軍的人事管理也曾出現過許多問題，例如地方守備苛扣軍餉便是其中一例。關於守軍將領苛扣軍餉，用以中飽私囊的情況，在當時被稱為「剝軍」。而在張家口相關的明朝檔案中，也可以發現關於懲處剝軍的相關案例。據崇禎二年（1629）六月兵部題稱都察院參劾張家口守備周國光剝軍一案，「周國光以衛口守備，責任不為不重，乃傾身閹寺，肆意橫行，內則挾嚇官民，外則賈怨夷虜……種種贓私，確有證據，大都罪盈惡極」。¹⁵⁸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中央對張家口守備周國光的懲處，並不只是單純的清查貪腐，背後也牽涉到崇禎初年明廷對魏忠賢黨羽的政治清算。換句

155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登錄號 035400。

156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登錄號 035400。

157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十三年七月八日，登錄號 035344。

158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登錄號 034167。

話說，崇禎初年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實際上連帶影響了張家口的軍務以及人事管理。

除了朝廷政爭的影響外，監察系統的掣肘與崇禎帝本人的猜忌心理，都曾對張家口的軍事管理造成過一定的負面影響。如崇禎五年（1632）七月十九日兵科抄出題稿稱，直隸監察御史胡志藩稱守軍探得女真人前來旋即東返的情報，卻沒有積極迎戰，因而參劾守軍諸將。宣大總督張宗衡（?-1642）雖上疏稱「張家口將備公然」，然而崇禎帝反認為張宗衡有「通虜辱國」之嫌，由此足見朝廷中央對地方大員之猜疑。¹⁵⁹

明朝邊政除內部的隱患之外，另一方面，蒙古人為獲取物資而頻繁劫掠張家口，甚至是拆毀邊牆，更是持續地衝擊了明朝的邊防體系。據崇禎五年（1632）二月兵部塘報，張家口堡管守備事都司劉惠稱：「有賊夷二十餘名從絕虜墩西空扒牆入內，一半在牆瞭望，一半撲路」。明朝檔案裡所謂的「撲路」，即是沿途搶劫路人，而這些入邊的蒙古人，搶奪了路行商人茶葉五百餘包。隨後明朝守軍雖然追回這些財物，但卻無法有效地阻止蒙古人頻繁地「扒牆而入內地搶掠」。¹⁶⁰如十多天後，又有蒙古人十二名在同年二月二十二日突入張家口下轄的破虜臺，¹⁶¹蒙古人頻繁地翻牆越境搶劫，也突顯出明軍守備張家口的管理困難。

蒙古人除了小規模聚集並越境搶劫張家口商旅，也不時有大規模越境行動並進而與明軍發生軍事衝突。如據崇禎七年（1634）九月十五日張家口守備高進忠塘報，察哈爾部屬下一位名叫「他速兒害解生」的將領，擅自帶領二十七名蒙古騎兵「前來市口牆下」，並有三百多名蒙古人在邊外駐紮。隨後這些駐牧在邊外的察哈爾部眾通過尚未修築城垣的防禦漏洞進入張家口，與明朝駐軍發生衝突。¹⁶²而這位「他速兒害解生」（Tasurqai jayisang），即為後於天聰八年（1634）十一月投降皇太極的古英塔蘇爾海（Güyeng tasurqai）。¹⁶³相較於小規模的結夥搶劫，上百名的蒙古騎兵闖入邊牆，無疑對明軍造成了更大的守備壓力。

159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五年五月十八日，登錄號 034159。

160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五年二月十七日，登錄號 034133。

161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登錄號 201475。

162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登錄號 033702。

163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天聰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卷 21，頁 278。

除了掠奪經濟物資外，也有不少蒙古人來張家口打探明朝的邊防情報。如崇禎七年（1634）十月十一日張家口守備高進忠在兵部塘報稱，自稱從「西黃河土擺吉囊」（Toba jinong）處前來的「七慶朗素喇嘛」（Secen nangsulama）帶領的蒙古人前來張家口說要做買賣。而張家口守備高進忠在考量情勢後，認為這些蒙古人並非真來做買賣，反而「多是奴酋從西邊調來夷人往東去，繇舊路所過，假稱稟見上司，實為慢我哨瞭」。¹⁶⁴而隔天當有司準備親自調查時，七慶朗素喇嘛等人已經往東北方離去。明朝張家口守備的這個判斷，其實並不是草木皆兵。根據《清太宗實錄》，這份檔案中所提到的「土擺吉囊」，即是於天聰八年（1634）六月投降皇太極的察哈爾部首領「土巴濟農」（Toba jinong）。¹⁶⁵當七慶朗素喇嘛等人來到張家口時，土擺吉囊其實已經臣服於金國，成了天聰汗的子民，因此其屬下七慶朗素喇嘛等人往遼東行去，自然極有可能是與女真人交通。而當時遠在遼東的金國，也確實非常關注張家口的一舉一動，如崇禎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右僉都御史焦源清（?-1644）題稱從邊外難民口中，獲悉女真人即將來犯宣府的情報，並做出「慮及張家口係撫夷市賞之地，為奴所必窺」的準確推測。¹⁶⁶而明朝官員的這句話，也點出了張家口溝通中原與內亞的重要地位。

除了掠奪物資與打探情報外，通市、請賞與投降也是蒙古人來到張家口的主要動機。1632年察哈爾林丹汗被皇太極擊敗後，許多察哈爾人開始四處逃竄。崇禎七年（1634）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府總兵盧抱忠手本內稱，有名叫苦敬的蒙古人前來張家口投降，而苦敬的口供中自承：

原係白言台吉部落，先年曾在張家口邊外守口，後跟隨插酋到西邊陝西地面，有插酋王子因害痘子死了，彼時有小王子未動。夷等跟隨插酋下宰生克探且兒被、把督罵宰生等大亂，領夷等六七百名，走了三個月，到邊外地名歸化城駐牧。九月內，有把督罵宰生、克炭掣力背宰生、七慶宰生等行到獨石邊外舊開平。夷等男婦五名，因無盤費，偷回，晝夜奔張家口投降。¹⁶⁷

164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七年十月十一日，登錄號 034737。

165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19，天聰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頁 248。

166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七年閏八月十二日，登錄號 034496。

167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八年一月十二日，登錄號 034721。

上述明朝檔案保留蒙古降人之口供，深刻體現出林丹汗與皇太極鏖戰後，察哈爾人貧病交迫下的流離失所，而作為當時繁榮貿易市集的張家口，成為他們理想的投奔之處。

除了明朝漢文檔案中的蒙古人口供，滿蒙文檔案中的相關記載，更進一步的體現當時蒙古與女真／滿洲社會中的張家口意像。相對於在明朝官方眼中危機四伏的軍事邊鎮，滿蒙文獻中的張家口則更多地被賦予貿易集市的色彩。在十七世紀初的滿蒙文獻中，張家口經常被稱做「巴顏蘇布」(bayan sübe)，即蒙古文「富裕之口」之意。1627年察哈爾林丹汗向西用兵，擊敗蒙古哈刺慎部，將其游牧勢力擴張至張家口邊外。翌年林丹汗持續西進，劍指鄂爾多斯河套地區的蒙古土默特部，引發土默特與哈刺慎聯軍的反抗，遂爆發昭城(joo qota)之戰，並促成哈刺慎、土默特蒙古諸部與遼東女真人結盟，對抗向外擴張的察哈爾部。¹⁶⁸在此歷史背景下，天聰二年(1628)哈刺慎人以蒙古文致書皇太極，稱察哈爾有三千人前往「巴顏蘇布」向明朝請賞未果，在返程途中意外遭遇哈刺慎部隊，哈刺慎人因此將這些察哈爾人悉數殲滅。¹⁶⁹隨著哈刺慎人的這份蒙古書信被譯為滿文並被收入《滿文原檔》(滿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即《無圈點字檔》)，張家口作為「富裕之口」的意像也進入女真人的視野中。¹⁷⁰

與此同時，作為明代中國與內陸亞洲間資訊交流之重要節點，張家口的漢文名稱也為滿蒙人士所知悉。《滿文原檔》載天聰六年(1632)金國阿濟格貝勒(Ajige beile, 1605-1651)率兵擊潰察哈爾部後，欲將消息通知明朝，故曾令屬下「將此書信寄到張家口之門官」(ere bithe be jang giya keo i duka i hafan de bene)。¹⁷¹由此可見，當時女真人不僅知悉張家口的漢文讀音，並明確將張家口視為交通明朝的資訊管道。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黃河圖》(圖4)¹⁷²，其方位上南下北，

168 烏雲畢力格，〈史料之二分法及其意義——以所謂的「趙城之戰」的相關史料為例〉，《清史研究》，2002年1期，頁79-85。

169 蒙古文原文見李保文編，《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頁26-27。此份文書漢譯參希都日古編譯，《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匯編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384。

17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第6冊，頁233-235。

17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第8冊，頁186。

172 《黃河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021500。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pall?ID=8&SECU=1050204978&PAGE=rbmap/2ND_rbmap&VI EWREC=rbmap:4@@@1407340357#JUMPOINT (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內容主要以加圈點滿文標注位於長江流域以北的明朝府縣與邊鎮地名，實際上體現天聰六年滿文改革以後，女真人為南進而對明朝政區情報與中國地理資訊的求索。其中在張家口的漢文地名旁，以滿文音寫為 *jang ja ko*，並且繪出通往張家口上堡市圍的長城隘口。張家口在多語種史料中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也體現該地溝通漢、蒙、滿文化的關鍵地位，乃至滿蒙世界對於張家口的認知。相較於漢文中強調防禦的「堡」，張家口在滿蒙文史料的脈絡中，反倒往往被視為南向通往中原的「門」、「口」。

隨著金國勢力從遼東向西拓展到漠南蒙古河套一帶，張家口出現在滿蒙文檔案中的頻率也愈趨頻繁。天聰六年（1632）年六月十三日，皇太極擊敗林丹汗後，投書明朝張家口守軍提出議和，並要求明朝交出其趁察哈爾潰敗時搜刮的財物。¹⁷³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張家口守軍同意歸還所掠奪的察哈爾財物，女真人並進一步要求相互通市。¹⁷⁴ 六月二十三日，明朝方面遣人至張家口與女真人貿易。¹⁷⁵ 六月二十四日，女真方面遣使攜帶銀器與明朝貿易，以極為平實的價格購得蟒緞，並打探明朝方面的信息。¹⁷⁶ 六月二十七日，張家口守備連同女真使者一同前往邊外拜謁皇太極，行叩頭禮後獻上禮物，此後「科爾沁、滿洲、漢人在張家口（市）門大行市易」（*horcin, manju, nikan jiyang jiya ko duka de amba hūda hūdašaha*）。¹⁷⁷ 七月一日，皇太極致書張家口明軍，重申合約，並請張家口守軍派人到遼東協助雙方協商。¹⁷⁸ 而 1632 年皇太極之所以能夠成功擊敗察哈爾林丹汗，與女真間諜在張家口的情報蒐集不無關聯。如《滿文原檔》中崇德元年（1636）檔冊，便保留了皇太極在戰後對滿洲間諜論功行賞的記錄：「星訥：爾原係白身，初征察哈爾時，率二十人往張家口偵探蒙古居址形勢，時遇約五十家，潛守四晝三

17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186；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太宗 2，頁 790。

17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193；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太宗 2，頁 797。

17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194；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太宗 2，頁 798。

1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195；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太宗 2，頁 799。

17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196-198；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太宗 2，頁 801-802。

17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 8，頁 215；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太宗 2，頁 819。

夜，以待阿濟格貝勒至」。¹⁷⁹而根據先前所蒐集到的情報，清軍更在崇德元年四月十四日由張家口入塞，也就是明朝方面所稱的「戊寅虜變」。對於清軍自張家口入塞的過程，《內秘書院蒙古文檔》中有一份很詳細的記載。這份記載說明了明朝張家口守軍內部的數百位蒙古人聽說崇禎皇帝下令屠殺使用蒙古名字者，因而殺害了明朝將領前來歸降皇太極。此外，據傳當時宣大一帶，有風水師傳言滿洲即將奪得天下。¹⁸⁰這些傳聞應是當時滿洲間諜在張家口所散播的謠言，同時亦可體現其在漢蒙藏資訊流通過程中，所具有之獨特地位。

六、結語

作為明代長城的邊境貿易城市，張家口在中原與內亞之間，除了防禦阻隔的消極功能外，同時也發揮互動交流的積極作用。綜合來看十七世紀初期明朝對張家口的軍事管理，大致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點特色。首先，自十六世紀下半俺答封貢以後，張家口成為明蒙互市的重要基地，明朝開始利用邊境貿易的手段來換取明蒙邊境的和平。然而有限度的互市，並不能滿足當時滿蒙人士對於中原物資的需求，最終導致十七世紀前期蒙古與滿洲勢力不斷前來張家口向明朝「講討貿易」，¹⁸¹乃至於以武力強行掠奪。¹⁸²晚明與滿蒙勢力之間的互動與往來，也正是在軍事衝突與貿易互市相互交錯的歷史背景下，於位處農牧交界帶的張家口推移展開。

結合明朝與清朝雙方的多語種檔案以及故宮珍藏古地圖等圖像材料，可以更加全面地還原張家口在十七世紀初的多元面貌。本文通過梳理《明朝兵部題行檔》等檔案記載，體現明朝在最後二十年中，極力希望通過張家口這個重要的據點，維持明朝在內亞世界的權威性。明朝一方面在中央財政狀況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撥下鉅款維修張家口的防禦工事；一方面又通過欽差御史、太監等朝廷耳目，試圖監控張家口守軍的一舉一動。不僅如此，明朝也通過在張家口對察哈爾人開放

17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卷8，頁66。

18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編，《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彙編》，輯1，頁90-92；希都日古編譯，《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匯編漢譯》，頁13。

181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七年十月十一日，登錄號034737。

182 《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崇禎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登錄號033702。

通市及發放賞賜，希望能夠達到以夷制夷的戰略目的。然而蒙古牧民迫於生計持續對張家口城牆進行破壞，以及明朝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相猜忌，卻大大削弱了明朝的邊防政策；而察哈爾林丹汗對明朝的時叛時降，更使得「以夷制夷」的戰略無法發生功效。終於在 1632 年，隨著皇太極向察哈爾部的進逼，林丹汗不得不退往河套地區，最終在 1634 年因天花而崩殂於青海大草灘。至此明朝以夷制夷的邊防策略徹底瓦解，在皇太極的威勢下，明朝張家口守軍不得不同意開放互市，贈予滿洲人為數可觀的贈品，甚至在謁見皇太極時叩頭下跪。

《明史》等後世作品，往往將明朝邊防政策的失敗，歸咎於朝廷官員與地方守軍的顛覆無能。然而明朝漢文檔案所反映的，卻是一個岌岌可危的中原王朝，極力通過鞏固張家口以挽救其在內亞世界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清朝方面所遺留下的滿、蒙文檔冊，更是詳盡地反映了滿洲人如何趁著張家口通市的機會，通過間諜分化明、蒙關係。由此說來，張家口對於內亞世界來說，不僅具有「富裕之門」這樣的經濟意義，更是滿洲人一統中原與內亞的權力之門。在張家口的情報蒐集，不僅使得皇太極成功地擊潰林丹汗，更成功地分化了明朝與蒙古人的關係，使得明朝最終未能成功「習夷制夷」，反而造成蒙古兵士向滿洲勢力倒戈，可以說是「為夷所制」。總而言之，通過對多語種檔案的整理與爬梳，可以發現張家口對於十七世紀的明、蒙、滿交流，實在具有關鍵之歷史地位。

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張家口的歷史積澱，使其在作為明代軍事邊堡的同時附加互市之職能，成為中原與內亞世界交通的主要管道，為十八世紀歐亞貿易下的張家口提供發展基礎，使之終成貫通清代庫倫（今烏蘭巴托）、買賣城（恰克圖）連接俄羅斯帝國的重要國際貿易通渠。1719 至 1722 年間，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1682-1725 在位）派遣伊斯梅洛夫（Лев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змайлов, 1685-1738）以及郎喀（Lorenz Lange, 1690-1752）等人率領使團由聖彼得堡出發經西伯利亞、蒙古一路訪問清廷，而張家口正是其往返北京的關鍵一站。1720 年 11 月俄國使團穿過長城抵達張家口一帶，隨行的蘇格蘭醫生貝爾（John Bell, 1691-1780）在行記中載該地係「一頗具規模之市鎮，名喀爾干」（a considerable town named Kalgan）。¹⁸³ 經俄羅斯方面的引介，張家口遂以 Kalgan

183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Glasgow: R. and A. Foulis, 1763) vol. 1, 337; vol. 2, 118.

之名聞於歐洲。西文史料所以稱張家口爲 Kalgan，源於俄文 Калгань 對蒙古語「門」(qaǰalǰan) 的音寫。張家口以其蒙古名爲西方所知，在體現中央歐亞大陸 (Central Eurasia) 交通清代中國與歐洲媒介地位的同時，亦爲重新檢視長城堡寨在明清之際的歷史作用提供新思路。要言之，在明朝長城體系中張家口雖係阻絕蒙古之「堡」，另一方面卻無疑更是交通近世漢蒙滿乃至歐亞大陸的「門」。

後記：本文爲執行中央研究院關鍵突破種子計畫 (編號：AS-GCS-112-H01)、國科會計畫 (編號：NSTC 111-2410-H-001-005-MY3) 成果之一。研究緣起自 2016 年夏季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之田野考察期間，感謝那仁畢力格一家熱情款待；同年 8 月 16-18 日應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特木勒之邀，自內蒙乘車往赴張家口參加「張家口·冬奧會與一帶一路」國際學術研討會，遂得親睹張北草原形勝。本文初稿各節曾先後宣讀於 2023 年 6 月 1 日「2023 明代跨界史研究」國際會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及 The James P. Geiss and Margaret Y. Hsu Foundation 合辦)、2023 年 6 月 12 日史語所「基礎建設的歷史」讀書會及 2023 年 9 月 3 日「多語種文獻與中國北疆民族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內蒙古內蒙古師範大學主辦)，席間幸得與會先進指教。本文修改期間，承蒙匿名審查人賜正。謹致謝忱。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元) 脫脫等纂，《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 司馬光編，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平：古籍出版社，1956。
- (明) 王圻，《明萬曆續文獻通考》，收入《元明史料叢編》，輯1，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 (明) 王圻，《類書三才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雍正乾隆間黃晟槐印草堂後印本。
- (明) 王崇獻，《宣府鎮志》（正德），北京：綫裝書局，2003，據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影印。
- (明)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 (明) 汪應蛟，《撫畿奏疏》，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明) 金幼孜，《金文靖公北征錄》，收入《紀錄彙編》，冊9，上海：涵芬樓，1938，據明萬曆沈節甫輯、陽羨陳于廷刊本影印。
- (明) 茅元儀，《武備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天啓元年（1621）刊本。
- (明) 孫世芳，《宣府鎮志》（嘉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
- (明) 張學顏，《萬曆會計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831-8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萬曆九年（1581）刻本影印。
- (明) 莊際昌，《崇禎朝論對錄殘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末鈔本。
- (明) 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刊本。
- (明) 湯北京，《靈護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冊98，濟南：齊魯書社，2002，據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 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東京：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彩繪本。
- (明) 葉向高，《寶顏堂訂正四夷考》，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輯18函5，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尙白原齋刻本影印。
- (明) 鄭汝璧，《由庚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356-13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明) 蕭大亨，《北虜風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鈔本。
- (明)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明)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4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清)左承業纂修,《萬全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道光刻本。
- (清)汪楫,《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清鈔本。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清)賽尚阿(sayišangg-a)編,栗林均、斯欽巴圖重編,《蒙文倒綱—モンゴル語ローマ字転写配列—》,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14,據咸豐元年(1851)刊本整理。
- 《明實錄·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實錄·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編,《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希都日古編譯,《清內秘書院蒙古文檔案匯編漢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 李保文編,《十七世紀蒙古文文書檔案:1600-1650 (arban doluduḡar jaḡun-u emün-e qaḡastu qolbuḡdaqu mongḡul üsüg-ün bičig debter)》,通遼: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
- Bell, John.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Glasgow: R. and A. Foulis, 1763.

近代論著

- 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新史學》,31卷1期,2020年3月,頁53-102。
- 王士銘,〈乾隆年間色楞格河流域的經貿政策與聚落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6期,2021年11月,頁47-92。

- 王士銘，〈清代庫倫至恰克圖間民人的土地開墾（1755-1911）〉，《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7期，2017年6月，頁83-140。
- 王苗苗，〈明代蒙漢互市貿易的建立及發展演變——以市口變化為中心〉，《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4輯（2011），頁81-109。
- 王苗苗，〈明蒙互市貿易述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
- 王苗苗，〈略論明代遼東蒙漢互市貿易管理〉，《民族史研究》，第10輯（2011），頁68-81。
- 田口宏二郎，〈畿輔礦稅初探——帝室財政、戶部財政、州縣財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20-31。
- 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77。
- 艾冲，《明代陝西四鎮長城》，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 余同元，〈明代馬市市場考〉，《民族研究》，1998年1期，頁62-70。
- 余同元，〈明後期長城沿線的民族貿易市場〉，《歷史研究》，1995年5期，頁55-70。
- 吳兆慶，〈明後期宣大山西三鎮馬市市本來源考述——兼述撫賞銀在市本中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年5期，頁44-55。
- 吳彥儒，〈明嘉靖朝宣府鎮的軍事措施之研究：1521-1566〉，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呂美泉，〈明朝馬市研究〉，《求是學刊》，1999年5期，頁98-102。
- 李華彥，〈「小王子」家族與歸化城土默特部的開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7期，2017年6月，頁35-81。
- 李華彥，〈明朝朵顏衛的來源、發展與動向〉，《明代研究》，38期，2022年6月，頁75-107。
- 李華彥，〈林丹汗索賞與崇禎朝遼東撫賞政策之重整〉，《亞洲研究》，10期，2010年8月，頁51-82。
- 李漪云，〈明代長城腳下的蒙漢互市〉，《中國民族》，1981年5期，頁22-23。
- 李漪云，〈從馬市中幾類商品看明中後期江南與塞北的經濟聯繫及其作用〉，《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4期，頁34-39。
- 李巖、張玉坤、解丹，《明長城九邊重鎮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8。
- 周小棟，《雄關漫道：明長城防禦體系的建造及保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21。
- 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
- 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明代研究》，27期，2016年12月，頁1-69。
- 邱仲麟，〈明代長城線外的森林砍伐〉，《成大歷史學報》，41期，2011年12月，頁33-102。

- 邱仲麟，〈明代的煤礦開採——生態變遷、官方舉措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清華學報》，新 37 卷 2 期，2007 年 12 月，頁 361-401。
- 邱仲麟，〈國防線上：明代長城沿邊的森林砍伐與人工造林〉，《明代研究》，8 期，2005 年 12 月，頁 1-66。
- 金星，〈明朝與蒙古的貿易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 阿薩拉圖，〈明代蒙古地區和中原間的貿易關係〉，《民族團結》，1964 年 Z1 期，頁 51-56。
- 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燕京學報》，23 期，1937 年，頁 183-237。
- 哈正利，〈明代蒙漢民族貿易投影下的民族關係〉，《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 年 3 期，頁 62-66。
- 哈正利，〈明代蒙漢民族貿易淺析〉，《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 5 期，頁 125-128。
- 段宏廣、劉振瑛，〈「張庫大道」研究述評〉，《長江叢刊》，2018 年 23 期，頁 68。
- 胡凡，〈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衝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 年 4 期，頁 43-55。
- 胡凡，〈論明穆宗時期實現「俺答封貢」的歷史條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 年 1 期，頁 37-45。
- 范熙暉、張玉坤、李巖，〈明長城軍事防禦體系規劃佈局機制研究〉，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9。
- 唐玉萍，〈明朝嘉萬時期對蒙政策探論〉，《社會科學輯刊》，2002 年 6 期，頁 115-120。
- 孫召華，〈明代張家口堡考論〉，收入朱誠如、王天有編，《明清論叢·第 8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 208-218。
- 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 本 4 分，1933 年，頁 537-576。
- 徐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 卷 2 期，1988 年 12 月，頁 179-190。
- 烏雲畢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義——以所謂的「趙城之戰」的相關史料為例〉，《清史研究》，2002 年 1 期，頁 79-85。
- 烏雲畢力格，〈明朝兵部檔案中有關林丹汗與察哈爾的史料〉，收入 Futaki Hiroshi, Demberel Ulziibaatar eds., *Researching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ngolian Histo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2004，頁 203-230。
- 烏雲畢力格，〈《阿薩喇克其史》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 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期，2005年3月，頁43-100。
- 曹永年，〈明代蒙古中晚期的經濟〉，《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2期，頁56-65。
-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 陳宏文，〈明萬曆三大征軍費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陳新海，〈明清時期草原絲路沿線城市張家口的發展與職能演變研究〉，《史學集刊》，2021年3期，頁60-68。
- 湯羽揚主編，《中國長城志·建築》，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 舒曼，〈古代張家口茶馬互市與張庫大道（茶葉之路）之芻議〉，《農業考古》，2014年2期，頁215-222。
- 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下冊（1967），頁459-473。
- 楊申茂、張玉坤、張萍，《明長城宣府鎮防禦體系與軍事聚落》，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8。
- 達力扎布，《明代漢南蒙古歷史研究》，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 趙現海，《明代九邊長城軍鎮史：中國邊疆假說視野下的長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趙會清，〈明蒙的通貢與互市政策形成的原因初探〉，《滄桑》，2007年1期，頁20-21。
- 劉菽、楊永康，〈朝貢視閥下的明蒙互市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年3期，頁135-145。
- 蔡偉傑，〈居國中以避國：大沙畢與清代移民外蒙古之漢人及其後裔的蒙古化（1768-1830）〉，《歷史人類學學刊》，15卷2期，2017年10月，頁129-168。
- 蕭國亮，〈明代後期蒙漢互市及其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年2期，頁64-70。
- 賴建誠，《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 賴惠敏，《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北京：中華書局，2020。
- 薄音湖，〈把漢那吉的家庭糾紛〉，《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卷3期，2001年5月，頁27-31。
- 薄音湖，《明代蒙古史論》，臺北：蒙藏委員會，1998。
- 薄音湖，《青城論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
- 薄音湖，《蒙古部落的歷史變遷（元明時期）》，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20。

寶音德力根，〈十五世紀前後蒙古政局、部落諸問題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7。

寶音德力根，〈達延汗生卒年、即位年及本名考辨〉，《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6期，頁1-9。

寶音德力根，〈應紹不萬戶的變遷〉，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續編）·歷史學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上冊，頁394-436。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局，1999。

ボルジギダイ・オヨーンピリグ，〈17世紀前半のモンゴル史に関する明朝兵部文書について〉，《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2號，2003年9月，頁142-147。

川越泰博，《明代長城の群像》，東京：汲古書院，2003。

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変容》，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

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期の大同反亂とモンゴリア（下）——農耕民と遊牧民との接點〉，《東洋史研究》，31卷1號，1972年6月，頁64-81。

萩原淳平，〈明代嘉靖期の大同反亂とモンゴリア（上）——農耕民と遊牧民との接點〉，《東洋史研究》，30卷4號，1972年3月，頁30-54。

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東京：同朋社，1980。

森川哲雄，《15世紀—18世紀モンゴル史論考》，福岡：中国書店，2023。

Avery, Martha. *The Tea Road: China and Russia Meet Across the Steppe*.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3.

Dardess, John W. *More than the Great Wall: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Ming National Security, 1368-164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9.

Frye, David. *Wall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Blood and Brick*. London: Faber & Faber, 2018.

Serruys, Henry.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I.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5.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網路資料

（明）尹耕，《兩鎮三關通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12402117/>，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明）楊時寧等纂，《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收入《中華古籍資源庫》，中國國家圖書館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10024&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411999025260，檢索日期：2023年5月1日。

(明) 魏煥，《皇明九邊考》，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item/2001708572/>，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mcttp/>，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pall?@419341032>，檢索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明)《九邊圖·第五宣府鎮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0850。
- 圖 2 (清)《直隸宣府鎮輿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600。
- 圖 3 (清)《宣府鎮圖本》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350。
- 圖 4 (清)《黃河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500。

The Gate of Assembly: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in Kalgan from the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Kung, Ling-wei**

Abstract

During the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Kalgan (Zhangjiakou bu) was the crossroads between northern China, Mongolia, and Manchuria. Through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Kalgan, the Ming dynasty attempted to maintain its so-called tributary system which nominally vassalized the Mongols and Jurchens (later known as the Manchus). Furthermore, the Ming also built intelligence networks based in Kalgan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Mongolia and Manchuria. By sending Mongolian-speaking spies, the Ming intended to divid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ongols and Jurchens. Briefly, the Ming frontier policy significantly depended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peoples in Inner Asia.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ngols and Jurchens interpreted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ways different from the Ming and therefore took “paying tribute” as a great chance to conduct economic exchanges with China in Kalgan. Meanwhile, the Jurchens also took advantage of Kalgan’s pivotal location to contact with the Mongols. Namely, Kalgan was a critical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chu-Mongol relationship. By using multilingual sources, the present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critical status of Kalgan from 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The multilingu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Chinese, Mongolian, and Manchu, formed between the fif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rovide diverse sources for studying Kalgan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Sino-Mongol-Manchu rela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ld Manchu Archives*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Routine Memorials of the Ming Board of Military Affairs* and *Mongolian Archives of the Qing Palace Secretariat Academy* at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ogether with related records in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and old maps from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s of Kalgan with its surrounding fortifications and horse market in the late

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diverse ethnic groups of the Chinese, Mongols, and Manchu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key role that Kalgan played in 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Northeast Asia.

Keywords: Zhangjiakou Fortress, Han-Manchu-Mongol relations,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Ming-Qing multilingual archives

* Received: 7 August, 2023; Accepted: 3 May, 2024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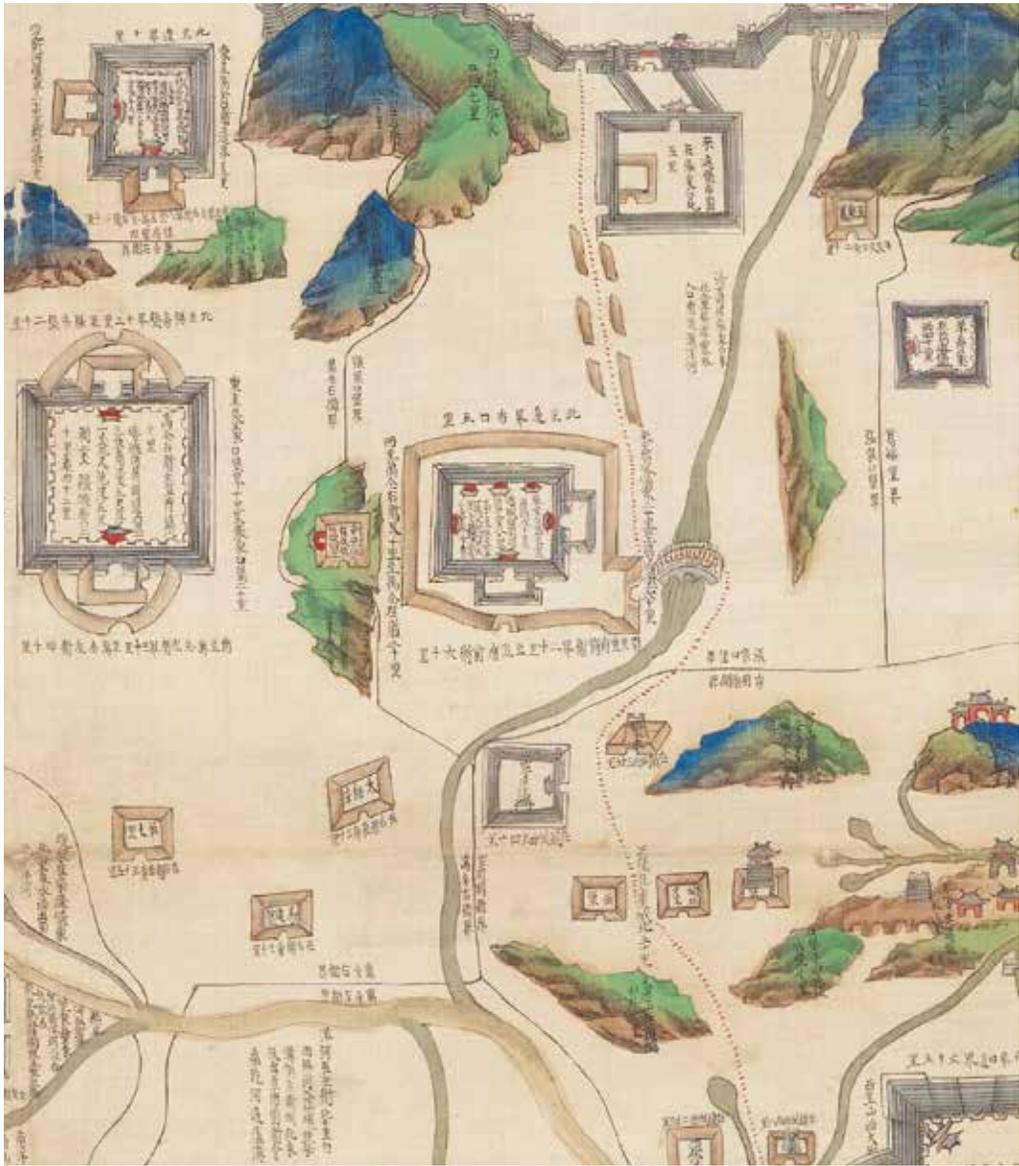


圖 2 清 《直隸宣府鎮與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宣府鎮圖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清 《黃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